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德 國 國 社 黨 史

(五)

郝 登 著

林 孟 工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德國國社黨史

(五)

著 登 郝

譯 工 孟 林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史黨社國國德
册五

Histoire du National Socialisme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原著者

Conrad Heiden

譯述者

林孟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五七四

張

二

第十五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

一 國務總理施萊轍

巴本之繼任者為施萊轍將軍。施萊轍之接受新職務或許不是他本心所願意的。興登堡在坎中常常希望離開這個狡猾的政客和危險的軍官；他對於後者之前此的敬愛，現在一變而成爲確實的冷酷無情。他懷着惡意的歡心，而將兩前任者所陸續失敗的任務交於施萊轍。巴本曾得總統的許可，得下令解散國會，以應付國會的頑強態度。反之，施萊轍則不會從老元帥手裏得到表示信任的證據，因此，在開始時期，他已經受失敗的處分了。這裏面最堪發噓的事實，乃是施萊轍不會立刻明白自身所處的非常的环境，到了危殆的一刹那，他纔看見輪到自己永遠不變的陰謀家的身上而受人之如何殘狠的播弄了。

這樣的，第一次在德國共和政府的歷史，一個將官出來充任國務總理。他完全不照大家所期待於他的辦法來統治德國。施萊轍將軍拋開軍人獨裁的幻想而這種情形並不僅由口頭表示出來的。果然不錯，他實因為不願意這種獨裁政權，所以推翻巴本內閣，而絕不是基於個人的野心而作這個舉動。因為本身充任國務總理的理想並不是使他極端動情；他或許寧願扮演類似畢爾蘇資基（Pilsudski）將軍之以陸軍部部長的地位而在波蘭所扮演有效力的腳色。施萊轍之自信他的政治天才，實超過於信任他的機關槍，而這種『文人』的自尊心也同他的失敗有着不少的關係。

他有着雙層的任务排在他的面前：他須成爲積極的國家主義的國務總理，同時又須爲德國社會改造的建築師。至少在他的色彩上，我們可以形容他爲國社主義的總理，而他同希特勒所發生的決鬪，並不僅僅爲着爭取政權，但也因爲爭在他兩人中決定誰來完成國社主義的任务。

從凡爾賽條約產生後，德國的國家主義是處在兩難論之下：或者說，凡爾賽條約的各條規定，在不可忍受的各部份裏面，應視爲『戰勝者』的精神作用。在這個情形下，則到這個精神作用過

去後，修改條約是可能的。照這樣想，任何人都不如斯特萊斯曼所得到的成績，他使德國人民心中確信修改條約是可能的，換句話說，即與法國妥協是可能的。或是說，凡爾賽條約恰是這個信念的反應，存在於其他的民族心中，而將德國以同伴的地位加入國際和平協調，這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情形下，則任何友好妥協的希望都是不可能的；而為免除凡爾賽條約之不可忍受的條件起見，祇剩下堅忍與抵抗，必要時候用武力。第二種見解之最明白的代表者，乃是希特勒。

二 挺進隊之募捐

新國務總理的任務，即為在這個兩難中，尋求足供明白本身責任的政治家所採取的解決方法。在開始時期，他即得到一個功效：日內瓦裁軍會議曾承認使德國得到權利的平等實為會議的目的之一。在國內，新總理須用建設的設施，使國家得適應於經濟恐慌所創造的社會崩潰的環境……但是最緊急的問題仍然為制伏希特勒，如不能加以制伏的話，則與以消滅。

謁宮方面，忽然基礎沒有從前那麼穩固，牠所考慮的問題是如下：到發生衝突，國社黨與施萊

轍政府，到底那一個是比較脆弱的呢？因為，大家很恐怖的觀察到：希特勒主義勢力低減，而民衆心中則愉快的認明施萊轍是具有某種毅力的，並且希望他能夠善與利用。

到十二月，屠麟根縣選舉的結果又增進國社黨的傾頹。可是，若拿壓迫國社黨的金錢恐慌的問題來比較，則屠麟根縣選舉的不幸結果又無足稱道了。以實際上政黨的地位，國社黨固然有着不紊亂的財政；但是無數的出版所、儲藏庫、挺進隊制服販賣處、日趨繁華的各黨區及其各處褐宮，都負債纍纍；他們寫訴苦的信給各債權人，大小各貨主，而這些信一部份跑到敵人報紙的方面去。在消息靈通方面，有人估量這些債務總數達到一千二百萬馬克。窮窘到了那麼深重地步，竟使普魯士邦議會的國社黨議員取消付給邦議會聖誕節的賞錢。在全德國各城市裏幾萬挺進隊份子蜂擁街上，手提蓋了國社黨封條的撲滿向公衆捐錢，情形實類似被免職的兵士，得到軍官之准許行乞以替代薪餉。挺進隊的下級首領，整批跑到敵人機關報的編輯室，以出賣國社黨的祕密消息來換取金錢。

在那時候總共六十萬挺進隊隊員裏面，有着一大批的失業者，和從未操持任何職業的極年

輕的少。但也有着各種職業之已有成就的人物，他們期待希特勒的勝利以求回復資產階級的生活。因為希特勒對於攫取政權採取了猶疑的態度，這些飢餓的隊伍便一天比一天感覺失望。漸漸的，內部的叛變陸續發生，這種事實是無足驚異的。後來，希特勒得到勝利，預報帶着離開危機之放心的情緒，照這樣情形而追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這個月中的空氣。牠說：『一種失望的情緒會擴展到四周圍。有人便說：我們絕沒有達到目的時候；堅持我們之永遠不變的要求，這實是瘋狂的舉動；不如接受人家獻給我們之任何部長的位置。』而戈培爾也公開承認他本人也疑慮國社主義是否驟然坍塌呢。

三 格烈戈爾·斯特拉塞之脫離希特勒

在這個瓦解的空氣之下，曾有着幾個人物，於違反希特勒的意志，想藉妥協施萊轍的步驟，以挽救國社主義運動。這些人物乃是佛力克與斯特拉塞。當希特勒禁止他們進行這種談判時候，佛力克完全服從命令，但斯特拉塞則第一次拒絕服從。斯特拉塞覺得國社黨陷於危機，足以使他遭

遇不幸的結果。他首先考慮財政的狀況，以為大家如果不採取一千二百萬馬克大借款的辦法來整理重壓國社黨各商業機關之無數的債務，則這些機關非宣告破產不可。這個整理辦法可用兩種可能的方法：第一是參加政權，這個方法可以堅定債權人的信任，而使國社黨得延長新的期限；只怕國務總理將用於『青年訓練』或『勞動救濟』的祕密費花光了。另一個辦法則為救援於私人經濟界，即來因蘭和威斯特發倫的重工業界。第一個辦法須與施萊轍妥協，後者是主持社會綱領的人物，並且自命為蔑視資本主義的人物；第二個辦法則拖帶國社黨更密切的接近大實業界與金融界了。斯特拉塞熟計國社黨與施萊轍決裂後必須走上第二條路線。或許是因為這個問題，關鍵所在的理由，逼他向希特勒要求作一個已經挨延好久的解釋。

斯特拉塞從這個談話出來後，心中大發生動搖。他認為希特勒的計劃是很無恥的，而且是反國家主義的。他便於寄給希特勒的一封信裏面，發表他的意見，這封信乃是一番正式的決裂，但他也表顯出一種久受壓迫的心事。斯特拉塞首先聲訴黨的指導機關在他的活動上所施的各種障礙，當然使他認為損害他的政治環境。然而他所要特別宣佈的，乃是說他再不贊成黨所採

取的政治方針，便是說，希特勒所採取的政治方針。他反對那些要求以殘狠的武力對付政敵的人們。他說，在各政敵中，實不乏可貴的建設的力量，誠懇的良好意志，不論是社會民主黨黨人或其它。德謨克拉西的政黨黨人，都有這種情形；大家不應使用暴力來排斥他們或壓伏他們。希特勒之實際上的行爲與他在宣傳裏面所標榜的理想，實完全不符。了解自身的責任與目標的指導部，竟爲戈培爾之矯僞的媚民行爲所籠罩，而且，在最高領袖的同意下，國社黨實走了絕望的政治路徑。這樣實準備演成混亂的和無政府的狀態，而陷德國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希特勒所遵循的路徑確在這些話裏面闡發無遺。然而，從第一天以來，他的路徑始終沒有改變。在希特勒心中，獲取政權的路徑是經過『共產黨的暴動』。換句話說，即經過大家所責備共產黨的暴行。斯特拉塞忘記了從前他自己也曾與高彩烈的走上這條路徑。但是到今天，他改變了，而贊成議會制與尊重法律的傾向都超過希特勒了。

爭論的結果是斯特拉塞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辭去他在黨內的一切職務。在某一刻那，費德曾想步他的後塵，但在開除黨籍的威嚇下，他又退縮不前了。斯特拉塞正式的脫離政府而從

事『休養』。不過，他仍然和施萊轍維持關係，且甚至為興登堡總統所召見；有人提他充任部長。他的脫離，並不使國社黨內部發生破裂，固然他曾擁有多量的和忠實的徒衆，如烈芬、特羅伯和哥尼斯堡黨區領袖愛立克科和（Erich Koch）。『斯特拉塞派』的勢力，便因首領之離開而歸於消滅了。希特勒於是在柏林召集他的派下各公務員與各議員，而在戈林寓中組織一個極動情的表示忠忱的舉動。他在那裏面曾表現了最有口才的動作，痛哭流涕而使在座者同樣落淚。這種動作正是真正的領袖的祕訣，他知道利用這種分裂局面所激動的情感，以進一步的加緊留在黨中各人的相互關係。在隨後那幾天中，希特勒可以將全國各地方所寄來的表示忠忱的信件裝滿紙筐了。

斯特拉塞離開後（但他仍然為國社黨黨員），得到勝利的乃是戈培爾與戈林的政策。一種媚民的政策，出於孤注一擲的博者手裏，結果不是獲得勝利便是全部失敗。新的口號是：救援我們啦，因為假使我們失敗了，德國將增加一千萬的共產黨了。

國社黨便是如此做法，像一個患狂熱病的女人一樣，以自殺的威脅來強迫德國經濟的領導

者與以救援而將它擁上臺面。

四 希特勒之得到救援

最初是一幫來因蘭的實業家，在鋼業聯合會的一個高級會員的領導下，償付了國社黨的債務之重要的一部份。

不過，我們不要因此而相信希特勒賣身於實業家。實際上，乃是他們感覺需要一個領導——這是不僅屬於物質上而且屬於精神上的破產的現象。他們之希望一個強盛的國家——在他們於興旺的時期中做了種種行為以使這個國家日見衰弱之後——實暗中含有極淺陋的和個人上的希望：希望國家用公道的價格向他們買回他們的股票，使他們得以擺脫財政的恐慌。這種『破產的社會主義』乃成爲許多資本家所抱的主義，不僅是最少數的資本家，而在易北河流域的大地主中也有着同樣的情形。所有這些資本家，曾經失掉勇氣和個人的信仰，以爲可以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他們的靠山。最滑稽的是他們完全不了解希特勒的目的。希特勒卻需要個人發起之

最大的努力，而他的『資本家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不但爲這些屈伏的資本家所不能了解，即加入挺進隊的共產黨人亦何嘗了解。

此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底，國社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方都感覺處於沒落的途中——力求在密切的攜手中彼此互相救援。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的一個信徒，哥隆銀行家士勒德（Schroder），安排在他家中使希特勒和巴本見面。他們兩個人於是重修舊好，而巴本便設法使希特勒了解應當加入所有各右派勢力的一個大聯合，這個聯合是包括着由興登堡總統與國防軍經過鋼盔團而達到胡根堡。巴本以經濟界各勢力的代表人資格而主持這次談判，當他在國務總理任上，這些經濟界勢力實爲他之最得力的靠山，牠們喜歡這個威斯特發命的貴族與薩爾大實業家之巴本，而不願意社會政策用意不明顯的施萊轍將軍；在巴本領導下同時又可以使希特勒加入裏面的新內閣，將使牠們格外得到保證了。

不過，在未來的合作問題上，這次談判并未產生任何協調。希特勒在那時候實無結合的餘力。

他唯一所關切者乃爲藉一番局部的勝利，不管是如何微小的，以恢復他之已見衰微的威望。所以在里卑·德特摩爾（Lippe-Deimold）邦，一個面積小到極點的小地方，他所進行的選舉宣傳，是比任何談判都重要。他從這一村跑到那一村，僅在數百人面前發言，自己覺得毫不在乎。經過這番工夫，他便得到超過於過去十一月與十二月所得的票數。無疑的，這不過是表面上小勝利而已；他實犧牲了整個的森林以建築一個鳥巢。然而，黨中同志卻因此而恢復自信力了。在舉行這次選舉前幾天，弗蘭墾的奧沙夫斯蒂格曼（Stegmann）藉辭職來反對努連堡黨區領袖斯特萊撒的私人醜穢的生活。但這種情形已經存在了十年之久；何以到今日纔見爆發，無非是一般恐慌的現象而已。里卑選舉的成績，絕不能壓制這種恐慌但至少可使牠不至於擴大。

五 斯萊撒的大計劃

當希特勒正在應付黨內的恐慌時候，施萊撒也在努力對付內閣的恐慌。大地主所領導之強有力的農民組織『農民大同盟』不經事前的通告，忽然以未曾有的激烈狀態攻擊施萊撒。施萊撒

於取得政權後，曾表示他將照布魯寧所企圖的辦法，犧牲一部份不能藉本身的力量以繼續維持的大田地，以供國內殖民的使用；他不曾想到因為這個而自己宣告死刑。加之，他又不能將自己與人民彼此間的關係，樹立於堅固的基礎上面。他曾做了好些計劃，結果實使他因對勞動界之認識淺陋而受到傷害，尤其是因對靜力性過於積極性的工團官僚政治的力量，作了含有危險性的過高估量。施萊轍，尤其是他的各顧問以為在那裏而找到良好的意志，可以使之脫離國會各黨派，而加以組織，藉以實現德國穩定的復興局面。各工團本身也曾使人產生這種希望，因為它們曾表示，到必要時候，將與國社黨之有理性的份子合作，以支持施萊轍內閣。在這個計劃裏面，格烈戈爾·斯特拉塞的名字曾佔重要的地位，他們並沒有說不藉斯特拉塞以抵制希特勒。或許即是因為他們想藉這種新戰線的威脅，使希特勒表示比較馴良的態度。這些計劃內容，實含有過多的醜惡和過少的誠實，而施萊轍將軍便將拉薩爾所說的話作了一番實驗，即是說，在有些大事中，狡偽行為可使吾人喪失性命。無疑的，施萊轍以為在自己面前有好幾條路線可走，而他便想保留選擇的自由呢。從第一計劃，第二計劃，以至於第三計劃等等，一一斟酌，這種參謀部軍官的腦筋，若是用於選

擇方法，可以成爲力量。但若在各種原則中，用這種腦筋來決定方針，則結果將大大不然了。

六 施萊轍之下臺

不管怎樣，施萊轍的計劃須有充分的時間以達到成熟的地步，而爲獲得時間起見，他非將國會延期不可。他希望藉舉行新選舉的威脅，可以強迫國社黨黨人對他表同意，因爲在新選舉中，他們必定要失掉許多票數（不管有里卑選舉的成績，任何人對這點都不至生疑問）。興登堡總統曾以解散國會的處分授與巴本國務總理，必然也可以將這個授與他了。然而，完全出他意料之外，施萊轍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得知總統竟拒絕授與他了！

經過的事實是如下：即是在前一天，巴本曾來謁見興登堡，向後者保證說，他已經得到希特勒的同意，以實現一種『國民團結』。但希特勒堅要以國務總理位置給他自己。當然的，老元帥反對這個要求，但巴本會靠幾個必要的慎重步驟，約定希特勒服從他的意思。依這樣情形，國社黨不得攫取外交部，也不得攫取國防軍；在內閣裏面，他們僅是一個少數，而巴本本身雖然處於國務副總

理的地位，實將爲總統府與政府之間的唯一的中間人，換言之，即是真正握有全權的人物。

假定施萊轍，在已經辭職之後，不曾想玩一套特別狡猾的把戲，以防備與登堡再召巴本組閣的話，或許到了最後，興登堡不是摒棄上面所說的辦法。這種違反民意的內閣，施萊轍說道，不能夠維持下去，也不能夠長時期得到國防軍的擁護。施萊轍是這樣的計算：如果組織巴本內閣是不可能的，總統因爲對於希特勒懷有人人所知道的反感，便不得不喚我出來。因爲在施萊轍背後，實站着撼搖不動的整個國防軍軍部，即是說：國家之最可畏的和最必需的勢力。

國防軍各將領於是冒險作最大膽的行動。他們目擊領袖在總統身邊，因爲巴本的緣故，竟失掉他的勢力，而且與登堡大佐，從前原爲施萊轍的好朋友，現在卻轉而親近巴本了。「憲法所不會規定他的地位」之總統兒子，實爲他的父親所最信從的顧問，而且成爲紐狄克（*Neudeck*）之合法的地主，他對於施萊轍國內殖民的計劃，認爲直接損害與登堡家族的利益，因爲與登堡家族現在也名列於大地主階級裏面。或許施萊轍也曾放鬆了他與總統的兒子間個人上的關係，至於巴本，則鄭重維持這個關係了。在國防軍裏面，有人想道，無論如何，現在非排擠巴本不可。在這種情

形下於是產生了一個純粹軍人的浮燥計劃；藉反叛國家的罪名以幽禁巴本，因此使總統處於既成事實的局面中，再使波斯丹警備隊作一番示威運動，更可進一步增高這次小小的苦迭達的氣燄了。到了現在，我們還不能斷定施萊轍之外交行動的謁見老元帥，是否即與這個好戰的計劃有着連帶關係；當然的，所有參加那裏面的人物，都極力否認，或絕口不提。不管如何，他們所計劃的苦迭達，卻發生了與他們所期待的完全相反的結果。祕密洩漏到外間，希特勒由是知道有迅速下手之必要，如果他不願意在這一次，於對方的武力行動下，又無可挽救的失掉政權。像施萊轍一派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底所作的政治計劃，竟到了那種錯謬的地步，實我們所極少看見過的；唯有離這個時期不遠後，希特勒政府的狡猾無可復加的計劃所觸犯之更可慘的錯謬，差可與前者相比較。當巴本開始他的交涉時候，與登堡實不願意在巴本身邊復有國務總理之希特勒，希特勒也不願意與巴本並列，尤其是與胡根堡並列，而充當國務總理。然而，一到了各將領的計劃發現之後，那兩方面的抵抗行動都驟然間消滅了。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那時是國防軍陷希特勒於失敗之地。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採取報復的行動，便由他來打擊國防軍了。

其實，希特勒早已看出巴本之拉他加入資產階級佔多數的內閣裏面，是想將打好的活結子套上他的脖子。但他卻切斷這個結子，所靠的工具乃是任何人都不能像他那樣善加運用的武器：他要求解散國會並舉行新選舉，作為他表示柔和態度的代價。因為，他深切了解這個事實：在巴本與登堡眼中，他不過將為表面上的國務總理；在民衆眼中，則他將成戰勝的政治運動家，平民而登寶座，奮鬪者而達到目的，叛黨而獲得勝訴了。他擁有從成功而產生的惑人力量，並且他現在可以利用前人所不會使用的工具：無線電廣播。在爭取民衆的擁護當中，他不怕各新同事，如巴本與胡根堡等等，能夠佔他先風，即僅僅緊追他的後面，也是不可能的。

但前，在內閣各部長中，卻有一人明白看到前途的趨向：這個人乃是胡根堡。哈次堡戰線之組織者（指胡根堡）看到哈次堡戰線的內閣到底快要產生出來，但他也看到內閣非用『哈次堡式』的方法不可。如果它不願形成一個單純的國社主義的內閣。他於是宣佈說：如果解散國會果然是必要的話，則當避免舉行新選舉，而以宣佈『社會危急狀態』代替後者——憲法上是不會規定這個處分的，但即是因為這個緣故，熱心擁護右傾獨裁政治的人們好早希望牠能夠實現；牠

又可使總統掃除憲法的掣肘。但希特勒毫不願意談這個問題；因為這裏面的意見，在進行中的談判幾乎陷於失敗。興登堡已經決意再任巴本為國務總理。即在這個時候，計劃拿捕巴本的聲浪傳到雙方談判者耳中，便使他們改取比較和順的態度。希特勒於是在極莊嚴的神氣中，發出他的誓約——據鋼盔團首領杜厄斯脫堡（Duestenberg）的敘述，這個誓約是這麼說：『不論三月五號的選舉結果是如何，所有參與在計劃中的內部各部長一概不更動。』

希特勒和巴本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午刻聯袂進謁總統，並報告後者說，『國民團結』已為既成的事實了。總統一口注重在這個團結字上，便以組閣的任務付託希特勒。他向希特勒說，他從前不能以這個任務交與國社黨領袖，但現在希特勒則為國民共同戰線的代表了。興登堡的國民團結，乃是老頭子的一個幻想。以這個團結的名義取得政權的國務總理，是很明白個中情形的。國務副總理也已經明白了嗎？在這些握手與宣誓的儀式中，實陰藏許多騙局與幻象，奸猾與含蓄的深意。

七 達到目的——希特勒任國務總理

於是，在希特勒身邊，設立很少的內閣所曾有過的國務副總理一席。充任國務副總理者乃為巴本，他同時任普魯士內閣總理；每遇國務總理與總統接談，他都在座；他實是這個『頑童』的『保姆』了。當然的，大家不能不將幾個重要的位置交與最大政黨的領袖。佛力克使任內務部長，戈林任普魯士內務部長。因此，各邦的警察監督權與國內最強有力的警察隊之自由支配權，都落於國社黨手中。不過，在普魯士邦內，巴本掌握最高的權威，而且在普魯士內閣裏面，與在中央政府內閣裏面一樣，國社黨仍然居於少數的地位。照憲法的規定，當然是由國務總理決定一般政治的方針。然而，在政治上絲毫都不懂的希特勒先生，便能反對一切嗎？因此，總統慎重的將外交責任交與保守派之牛賴特（von Neurath），將國防軍交與一個妥當的軍官，來自哥尼斯堡的布倫堡（von Blomberg）將軍。後者攜帶他的秘書長賴赫瑙（von Reichenau）大佐同來。誰曾注意到這個人是與國社黨有關係呢？其它的位置，多半重新落於巴本之知己的同事手裏；許威林·克洛

西格 (von Schwerin-Krosigk) 伯爵——有名的專門家——仍任財政部長，律柏納克 (Eilms von Rübennack) 子爵仍任交通部長，而基烈克 (Garecke) 博士則爲失業監督。基烈克爲興登堡的心腹；在興登堡被選連任那時期，他曾指揮宣傳的工作，因爲這個緣故，他於幾個星期後，被國社黨人從部長的座位拖入監牢。還有前任巴伐尼亞司法部長之孤爾脫勒博士。我們已經認識這個人，數年前曾阻止驅逐希特勒出德國境的便是他。胡根堡受到重要的兩部：經濟部與農部；他在普魯士內閣裏面佔領同樣的部務，因此他可以發揮他之專門家的才能——這實是他老早所希望的。他爲不願宣傳只管實際工作的內閣政治人物中之第一個，而且得有實現這個行爲的方法。鋼盔團首領佛蘭斯·塞爾德 (Franz Seldte) 任勞動部長。戈林也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內閣裏面佔領一個位置，他任航空部長。但還有一個人暫時無從安插，這個人乃是戈培爾。

希特勒是被放流到無望的少數地位嗎？希特勒受壓迫嗎？我們隨後便可分曉。

一月三十日晚上，國社黨慶祝它的勝利。勝利的大宣傳是開始了，並且三月五日選舉的勝利，大部份是基於此。在繼續好幾個鐘頭中，二萬五千個提燈人遊行於威廉街 (Wilhelmstrasse)；老

與登堡全身冰冷的站在總統府窗前。隔了幾步，在另一個窗前，站着全身舞蹈的希特勒。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那天，他在布格博羅酒店宣佈廢立中央政府以來，在羣衆面前，他從來沒有這次那麼高興。在他整個身上，祇看到凱旋的笑顏；他的上半身不倦的探出窗外而向羣衆行禮。

第十六章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五日

一 中央黨之失掉機會

『到我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復興那天，我的任務纔告完成了，』這句話是希特勒於一九二四年對慕尼黑的陪審員說的。

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他的任務是已經完成了嗎？輿論界的權威之十分正派的各報紙，都承認胡根堡爲真正的勝利者。在普魯士邦政府裏，與在中央政府裏一樣，胡根堡縮領四部的職務，而且是屬於經濟方面的各部，在這個苛刻計算的時代，牠們實代表真正的起重的槓桿。士威林·克洛西格伯爵乃爲厭惡國社黨人的右傾人物，他以財政總長地位看守錢櫃；至於國防軍裏面，則施萊轍的勢力似乎仍然很強盛的。絕對不，國社黨之加入政府，並不會實現國社主義之偉大的

革命恰是相反，從現在起，這個革命纔見開始；從現在起，纔開始希特勒之最偉大的和最可怕的鬭爭呢。

這個鬭爭的運動是追逐兩個目標，牠們恰與兩個方法相呼應。希特勒須藉熱狂的宣傳以獲取多數的民衆；我們所指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指他的龐雜的盟友。這個宣傳之最有力的武器，即爲希特勒之任國務總理這個事實。第二個目標則爲消滅他之一切敵人與競爭者，從共產黨以至德意志國民黨這個目標後來果然也達到，所靠的是使用——在結果上是兇狠的而在方法上是最精細的——國社黨所擁有的權力，但又不是國家之最高的權力。

中間會發生一幕劇景，使希特勒得涉過最後的難關。興登堡總統要新國務總理嚴密遵守憲法的規定，並且不得企圖擾亂國內和平，他對這點會特別堅持。所以，在下令解散國會前，他要嘗試是否可以找出擁護新內閣的多數。希特勒於是與中央黨領袖喀斯（Kas）開始談判，商量將國會延會一年。但喀斯拒絕作任何接談，祇寄一封信給希特勒，在信裏面，他向後者提出至少有十個以上的難堪的問題，等於強迫後者接受一個政綱，而且使國社主義的革命或復辟運動都不能實

現加之，中央黨又將信裏面所提出的各問題在報上發表；這實欲迫希特勒處於一種政治的羈勒之下了。因此，希特勒不費力氣，得到內閣各同事的同意，而與中央黨決裂了。他寫一封極和氣的信給喀斯，在信裏面，他向喀斯說，現在應當不要繼續談判，因為繼續談判的結果，祇有使他們彼此的關係發生破裂，他是想極力避免這種結果的。在上帝面前和在他自己的良心上，他感覺除解散國會外，沒有其它解決辦法了。這樣的，於無心中，中央黨給希特勒以動作的自由，使他隨後可以掃除保守派的各同事。

二 戈林之組織力量

國社黨之應用行政的機能，其迅速程度實可驚異的。他們所讓與德意志國民黨的各部，僅是無頭的機體；反之，戈林藉普魯士政府內務部的地位，指揮整個德國的行政機關。他一到就職後，立刻任命一批叫做名譽的部員，如衝鋒隊首領達魯格及他個人的助手荷爾（Hall）與遵麥斐爾特（Sommerfeld）等等；希特勒的律師律厄格布倫博士（Dr. Luetgebrunne）被任為法律顧問。

退職總檢察官格羅爾特 (Granert) 被任為警政處處長，格羅爾特為一個最早的國社黨黨員，且曾以多量的金錢捐輸國社黨。

立刻，免職與新任命波及全國。從各省省長以至於警廳刑事督察長，凡曾擁護左派政策的公務員，都被罷免或分發到候補班裏去。繼任的人物幾乎全部是國社黨黨員。許多挺進隊首領和舊日國社黨職員都充當警察總監，甚且替代那些政治主張極右傾的人們。柏林警察總監麥爾撒 (Meißner) 便是一例，他為巴本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推翻普魯士社會黨政府的主要主動者之一，現在被一個國社黨人，退職海軍少將利威素 (Lewickow) 所代替。即在三月五日的選舉前，有幾百個警界官吏已經在普魯士失掉他們的位置。唯有靠着這種積極的動作，戈林纔能於四星期的短時間中，組織一個權力出來，即使後來的局勢發展比較遲緩，德意志國民黨也不容易推翻這個權力。

爲使這個政治的新機能得到活動的效率起見，則當使牠握有某種全權，足使在巴本內閣時代已經大受摧殘的公民政治平等，從此永遠消滅。因此，總統不能不於二月四日簽署一個緊急條例，後者是取一個漂亮的名稱：保護德意志人民緊急條例。政府得條例賦予禁止某種露天開會與穿着某種制服的權利；每次政治的集會須於事先四十八小時通知官廳，如果官廳認爲危害公共安寧，可以下令禁止舉行；如果政府的當局人物受了侮辱，則可以立刻解散所開的會。同樣，報紙也可以受沒收的處分，如果牠犯了如侮辱各官吏或企圖嘲弄後者的罪狀。靠着這個富有彈性的條例，戈林屬下各警察總監可以隨意取締任何報紙或禁止任何敵人的競選演講會。在新政府成立頭幾個星期中，他們曾儘量行使這個機能；社會黨總機關之前進報，便於這種情形中，甚且在國會焚燬前，經過兩次取締，而來比錫帝國法院曾兩次解除禁令；法院第五庭曾於一天之中，在同一堂審裏面，解除七個取締報紙的禁令。

發生於下層的恐怖又助長了發生於上層的恐怖的氣燄。一到希特勒登上政臺，共產黨立刻散發舉行總罷工的通告，並且組織街面示威運動，我們應當承認共產黨的舉動實使對方容易有

所藉口。不過，局勢的演進實表現着國社黨已決計先發制人。在共產黨集會各地方，曾發生許多次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事件中，至少可以證明進攻者是屬於國社黨方面。挺進隊已經不將各方面敵人分別清楚，而搗亂他們的集會；在克里佛爾德（Krefeld），挺進隊便是這樣地搗亂中央黨所開競選演講會，向空開手槍以驅散參加者，並且傷毆演講人——前任部長斯泰哥華爾德（Steinwald）。中央黨另有許多次的集會都遇到同樣的情形；布魯寧博士即曾在其中一次會中演講。根據情報處的官方消息所稱，直到三月五日，在這些次衝突中，會有五十一個國社黨的敵人失掉性命，至於國社黨本身，也死去十八人。大家覺得內務部長戈林對他的國社黨同志的強暴行為，並不十分在乎；反之，巴本與胡根堡所提出的抗議，至少會使希特勒感覺為難。希特勒遂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一篇宣言，在那裏面，他力將這些強暴行為歸咎於敵人所雇用的煽亂者——但他並不會舉出證據來。這篇宣言有可注意的價值，因為牠為希特勒從這個時候起所發表二十多篇宣言中之第一篇，而且他在那裏用極力驅逐他本身所引用的惡魔。

四 戈林下令開槍

從那個時期起，鼓勵使用暴力與勸告遵循理智，於瞬息之中，更番輪替，總而言之，是處於異常的更迭之中。希特勒在他那方面，請大家採取鎮靜態度，戈林則公佈一篇有名的通令，在那裏面，他命令警務人員採取一切斷然的手段，以對付即在表面上對挺進隊與鋼盔團取惡意的態度；反之，他們須援助這些份子之一切『國民的』積極行動。『凡警務人員在履行他們的任務上而使用他們的武器，不論他們的行動會引起如何的結果，全由我代為掩護；反之，凡有不注意這個方針的行為者當受懲罰……』。這等於強迫各屬員跟隨他的瘋狂行動。每個警務人員，在出差時，遇到與左傾政黨的份子發生糾紛時候，須作這個考慮：如果我不開槍，我便有失掉飯碗的危險；如果我開槍，不管怎樣，總有人替我掩護。

五 警察別動隊

經過幾個星期後，至少在警察方面，國社黨人已經完成了他們的革命。

二月二十二日，戈林發表一篇命令如下：『……從應加防範的地方的面積過量增加後，眼前所不能照需要的程度而擴充的警察力量，從好久以來，甚至於有力履行牠的任務，都不可能了。警察義勇隊與別動隊都成爲不可少的。』

命令裏面，跟着指定加入警察別動隊的各種條件：須爲純正的德國人，有國家觀念與享有公權的人。這個警察隊的人員，可以穿着其它團體（卽如挺進隊與鋼盔團）的制服；祇須佩帶蓋了正式印章與寫了 *Hilfspolizei* 黑字的白色臂章。警察別動隊隊員每日領取三馬克的薪給。但政府眼中視爲最關重要者，則爲他們也領有膠皮製的警棍和手槍。

其實，這個命令不過實現了挺進隊的動員令，使之爲國社主義的革命效力而已。警察別動隊隊員祇可在鋼盔團中挑選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是屬於挺進隊份子，百分之三十是屬於純粹的隊伍之衝鋒隊份子。總共算來，在普魯士境內，招募了五萬人。我們若想在此後幾星期中所發生使全世界憤憤不平的各種行爲裏面，得到相當了解，則須明白武裝的挺進隊曾堂皇的履行它的

任務這個任務即爲以一種做榜樣的殘酷行爲恐嚇德國的輿論，遂使無需要打斷敵人之比較廣大的戰線的抵抗，爲的是這個戰線始終不敢組織起來。

六 共產黨的地窟

希特勒所要破壞的，乃是威馬爾憲法的德意志。從國社黨——自由的仇人——在國會中佔得多數後，這個自由的制度已經消滅了；然而，新的政敵可以採用某種新的方法，使舊制度死灰復燃，這種事實隨時是可能的。而且這些敵人可以比威馬爾的殘廢者更危險萬分，社會主義的工人與國防軍聯盟以推翻希特勒的獨裁，在那時候，這個局面是很可能的，而且不至受共產黨的掣肘。在國防軍裏面的某某團體裏——甚且在胡根堡的德意志國民黨內，曾有人沈着的考慮這種聯盟。可是，這裏面應與注意的，他們祇認這個步驟爲一種防守的辦法，以還擊國社黨的進攻。因此，國社黨保有先發制人的優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非常的現象：共產黨變成保守派政黨，反抗希特勒之最有力的支柱。在下

屆國會中構成一個多數，共產黨議席的數目實為成敗關鍵的角色。不錯的，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選出的國會中，國社黨並沒有得到多數；它與德意志國民黨聯合後，纔能得到。但到共產黨議員排走之後，國社黨便單獨擁有絕對的多數了。所以，在選舉前幾個星期中，國社黨最主要的工作乃為搗碎共產黨。祇有在這個觀點之下，纔可領會國社黨的全部行動。

二月二十四日，警察猝然闖入共產黨中央機關之李普克尼希（Liebknecht）館。黨的指導部已於幾個星期前離館，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在離館前，已曾慎重的攜走一切有關係的文件。事實上，大家並沒有聽說警察曾搜獲重要的文件，如黨員名單、組織計劃等等。情形固是如此，但仍不足阻礙公佈關於這次搜查所得物件之最荒誕的通告；通告裏而曾作如下的敘述：

『據康梯（Conti）通訊社的報告，政治警察會於兩天前關閉之李普克尼希館中，發現許多藏有大批供賣國行為使用的宣傳材料的地窖。此外，又發現一條地道，在歷次搜查中，警察所尋覓的人物，全由這條地道脫逃。直到這個時候，警察從未發現這些地窖和地道等等……』

『地窖裏面藏有好幾百擔的『賣國材料』，應為李普克尼希館中印刷機所印成的。在這些

傳單裏面，他們鼓動人民作武裝的叛變與流血的革命。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是爲着訓練與組織共產黨幹部用的。那裏面曾說，到革命爆發後，所有各地著名的資產者都應與以監牢和槍決的處分。」

經過三天後，普魯士官辦情報處又發表戈林的一篇宣言，以補充上面很空泛的報告：『德國非陷於鮑爾雪維克主義的混亂狀態不可。暗殺人民與政府的領袖，破壞國家的根本機關與公共建築物，毒殺整批特別可畏的人物，捕獲婦孺與有名望的人物作抵押品，這種種動作便可陷人民於恐怖的狀態，且消滅資產階級之一切抵抗的意志。』

『戈林部長在最短期間內即公佈這些文件。』

必然的，在每個公正的研究者心中，這篇報告裏面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後那一句話。可是，這些非常的祕密文件始終不曾發表。有人說，德意志國民黨派下各部長反對發表，因爲受控告各文件的性質，是過於不重要的。

據說，後面這些文件也含有暗殺國社黨各領袖以及破壞公共建築物的計劃。根據這個發現，

則戈林非受敵人的襲擊不可了。如果我們站在共產黨的觀念上，必然覺得在選舉的前夜，暗殺希特勒或戈林，則共產黨靠此所得的利益，必遠過於靠無用的縱火焚燒一座公共建築物。然而，官方的報告，則共產黨祇願採取後面的步驟。在官方的消息上，大家並不會聽說希特勒在那個時候曾有性命的危險。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約在八點鐘左右，柏林皇宮的救火夫發現在一間改爲辦事室的房內開始失火。他們立刻加以撲滅。在窗口攔板上與在暖氣管上，我們發現引火的小木頭，因此有人認爲故意縱火的企圖。各報館之得到皇宮失火的消息，乃在兩天之後，即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而一番更動人的事變在那時已經發生出來了。不錯的，即在這一天的晚上，下面的消息使全球震動。

七 國會縱火案

「星期一晚上，約在九時十五分鐘，救火隊被喚趕往國會，那裏面的圓頂發生火警。柏林十個火隊儘數趕往施救；大批警察也趕到那裏，而且立刻斷絕國會周圍的交通。救火隊趕到時候，中

央大圓頂已在燃燒之中，光星如雨點似的降落附近各處。救火隊和警察立刻鑽入國會裏面，因而能夠抓着一個人，後者很快的自認爲縱火者。他宣稱自己是荷蘭共產黨黨員。」

這個頭一個匆忙的消息發表後，隨後於二十八日頭幾點鐘，接着公布普魯士官方情報處的另一個消息。

「星期一晚上，德國國會發生火警。普魯士內務部長戈林先生於趕到失事的地點後，即親身指揮一切施救的工作。國務總理希特勒與國務副總理巴本，於得到首先的消息後，也立刻趕來。

「我們遇到在德國向所未有之最嚴重的故意縱火行爲，這是無可否認的了。經警察的調查，整個建築物，從下層到圓頂，遍佈着引火處。引火所用的材料爲柏油類和火把，這些東西是放在皮面坐椅中，印刷品堆中，門扇、窗簾、木版及其它容易燃燒的地方。有一個警士在黑暗的屋中瞥見許多人手提燃燒的火把。終於在這些放火人中捕獲一個。這個人爲二十五歲年紀的土匠，名爲凡得陸布（von der Lubbe），原籍爲荷蘭之萊提（Leyde）地方，身上攜有一張合式的

荷蘭護照，並且自認屬於荷蘭共產黨。

『國會中央建築物全部燒燬，議事廳及其演壇與花樓均受破壞。損失的數目達幾百萬以上。這次放火行為實為鮑爾雪維克主義所未曾在德國做過之最可怕的恐怖行為。在警察於搜查李普克尼希館中時候，所發現的幾百擔主張破壞的傳單中，我們曾找出關於用鮑爾雪維克的式樣而採取共產主義的恐怖步驟的訓令。

『各公共建築物，各府殿，各博物院以及根本重要的企業機關，均須燒燬。他們也曾指出，在與武裝的力量發生衝突時候，須將婦女與童孺，如可能的話，將警務人員的婦孺，排在恐怖的隊伍面頭。靠在發現了這種材料鮑爾雪維克革命之有計劃的實現是被我們所阻礙了。情形固然如此，但國會的縱火當為內戰和流血的叛變的信號。他們已經計劃於星期二早晨四時在柏林作大規模的劫掠。現在已經證明恐怖的行爲將於今天在全德國境內發生，以危害各主要人物，私有財產與和平人民的生命為目的，並且將牽動內戰。』

我們從各證人在來比錫法庭的審判中所陳述的內容，知道這篇官方的報告，至少在兩要點

上，是不正確的。當著者寫到這幾行的時候，萊比錫法庭的審判尚未結束，歷史家還不能將國會縱火案的來歷下一個確定的判斷。不過，我們已經可以證明下面的事實：官方報告堅稱警察曾在全部建築物中，尋獲柏油類製品和引火的火把。這一點是不確的；所有各警士與救火隊隊員都說不會在任何地方找出柏油類製品或火把。加之，官方報告堅稱凡得陸布曾自認隸屬於荷蘭共產黨。這一點也是不確的。凡得陸布曾特別聲明不隸屬於任何政黨。在另一篇的報告裏面，甚至說有人在凡得陸布身上搜出一張共產黨黨員證。這一點也是錯謬的；在審判中，捕獲凡得陸布的警察所報告的話曾與以證明。

官方報告還堅持另一點，直到現在，這點並沒有替它維護的證據。它肯定在李普克尼希館中搜出許多文件，照那裏面所說，國會放火不過是共產黨有計劃的行動之開始。隨後須跟着在它處放火，抓人，抓抵押人，甚至在各飯館裏面以毒藥滲入食品。戈林曾答應『在最短期間內』發表這些文件。直到現在，這些文件還不曾公佈出來，甚且不會在法庭中提出。我們還須提起這個事實：經在全德國境內共產黨的機關進行搜查後，沒有人聽說會搜得足供判斷紅色恐怖的陰謀之存在。

的文件。

我們還未算完官方報告所包含不正確的地方呢。官方報告還說道：『放火者在招供當中會自認與社會民主黨有關係。』又是不正確的斷言。在初步預審時候，佛格特（Vogel）法官已經報告說：『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非共產黨的方面曾與國會縱火案件有關係。』

在凡得陸布身邊，另有四個人坐在被告席中；其中兩人為著名的共產黨領袖：國會共產黨派議員的領袖托耳格勒（Torgler）與布加尼亞共產黨領袖狄米托洛夫（Dimitrop）；其他兩人為共產黨學生波波夫（Popoff）與馬其頓鞋匠塔捏夫（Tanef）。檢舉方面對於控告他們的幾個事歷，已經放棄不用，譬如有人指控托耳格勒及其同事庫侖（Koelen）曾於失火那天匆遽離開國會。還有國社黨議員喀瓦恩（Karwaine）與夫賴（Frey）及國社黨派公務員克瓦耶（Kroyer）在法庭所投的見證，若照這個見證所說，則托耳格勒曾在國會中與凡得陸布接談。這些證人怎麼想不到，在這個時間中，合謀放火的首領怎麼會在大庭廣眾的國會中與同謀犯商量他們的計劃；這點姑且不管。但檢舉方面至多也應該想到共產黨之放火焚燒國會到底對它本身有何利益。因

爲，放火是否祇使共產黨陷於利不的地位，對這個問題，唯有凡得陸布心中可以懷疑；托耳格勒與狄米托洛夫則不會有錯謬的見解。

即在放火的那一天夜裏，喀瓦恩便跑到督察長達魯格家，叫他踪跡托耳格勒。他們起初會照這樣做去，這是應然的事實；但到了偵查方面證明證據不充分後，他們還是固執不已，這一點實是怪異的。我們有時候曾以爲他們故意注重這個不可靠的偵察目的，在避免做另一方面的偵察。

一到放火的消息傳出後，所有外國的報紙都懷疑主動者不是共產黨。這種懷疑又得有德國國內的呼聲的呼應，這個呼聲是發自因縱火案而遭受或許更嚴重於共產黨的損失之政治黨派。不錯的，共產黨可以預料到，不管有沒有國會放火事件，它在德國合法活動的前途已經註定了。反之，在德意志國民黨看去，放火事件乃專有利於國社黨之特別重要的宣傳工具。除此之外，還有驅逐共產黨出國會的事實，其結果將減低保守派的地位。保守派方面，當然不欲阻礙揭開事件的真相，得以免除共產黨的罪狀，或許且將罪狀判歸其他人物的身上。

可是，在這一點上，保守派各領袖的意見不會立刻一致。胡根堡在他那方面，還且於三月二日

在俾勒斐爾德 (Bielefeld) 所作的演講中，說國會縱火事件是為共產黨人舉事的信號，同時也為他們的同謀犯社會黨民主黨人舉事的信號。胡根堡是採取國社黨的論調了。在這個時候，他的態度是否誠實的，或他所說的話是否違反他的本意，我們不能加以斷定。但至少他總不至不知道他的左右對於官方報告的正確性是抱着懷疑態度的。

在四月中間，有一篇記事小冊子散佈到柏林政界團體，對於國會縱火事件的內幕，曾有驚人的披露。後來，有人指出德意志國民黨議員奧柏佛倫 (Oberfohren) 為這小冊子的作者。無疑問的，奧柏佛倫博士曾在第三者面前宣佈與小冊子內容同性質的話，但若說冊子是出於他的手筆，則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證據。據一個靈通消息的來源說，真正的作者乃為一個右傾新聞記者，他在那個時候曾出入於奧柏佛倫所常往來的政治團體。

冊子堅認下手放火者為國社黨人，因為戈培爾博士希望產生一顆驚人的「選舉炸彈」。牠控告戈培爾與戈林為這次事件之道德上的主謀者，而北勒斯勞 (Breslau) 警察總監亨斯則為下手執行者。但牠並不指明這種控告是根據那一類的具體的事實。在三月底，普魯士警察曾搜查

奧柏佛侖博士的家，搜獲了反動的傳單。據警察方面說，這些傳單乃關於反對德意志國民黨領袖胡根堡之變相的和不署名的攻擊。奧柏佛侖博士立即辭去他的議員位置；到五月六日，警察方面宣佈他在基爾家中自殺了。或許有人因為對於死者不會發生損害，所以將那個文件諉於他的身上。這一點姑且不管。冊子幾乎完全轉載了在三月初流行於保守派各團體中的謠傳。在格來行 (Heinrich von Gleichen) 所主辦的右派雜誌『企業家同盟』(Der Ring) 三月第二號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論調：

「我們果然是盲目禽獸似的人民嗎？這次變故的煽動者藏在那裏呢？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他們是在何等安全的保障中而動作呢！以替代答覆這些疑問，我們冷酷的宣告說：我們缺乏如英國及其它國家所擁有的祕密警察……假定我們擁有這一類的組織，則大家今日便明白應向那一方方向尋求國會縱火事件的煽動者，而且也已經知道真正的下手之人。或許他們是德國的或國際的最優越的社會的會員呢。」

顯然的，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不容易掩飾一種比較顯明的口吻。而且發言者不僅格來行，奧柏

佛侖博士及上面所述的新聞記者。二月二十八日，內閣曾討論縱火事件，並曾將一篇半官式的紀述會議情形的通訊稿送給各報館。據佛蘭克福日報的登載，稿子內容是如下：

「內閣曾費大部份時間討論內務部特派員戈林所遞呈關於昨日縱火事件，柏林皇宮縱火的陰謀及李普克尼希館中所查獲各文件之極詳細說明的報告書。照戈林部長的報告書的內容，現在發出可靠的消息如下……。」

這裏面的話是代表什麼意義呢？當然是在政府內部，有人用起草這篇通訊所取的格式，極力將過去及未來的全部責任卸在戈林身上。起草這篇文章者，顯然使留心注意的人們明白了下面所述的情形是戈林說的，而不是起草者說的。這樣後，下面接着從新敘述共產黨所計劃之一切恐怖之步驟。通訊稿便繼續說道：

「關於國會縱火事件，已經無疑問的證明（這全是根據戈林的報告書說的）共產黨議員托耳格勒曾在國會裏與放火犯交談數小時。有人看到另有許多人在他身邊，而這些人中，便有在國會手提火把者在內，警察不能捕獲，或許因為他們從溝通國會與國會主席官邸的裝設暖氣管

的地道逃走。昨天晚上，另有兩人企圖從國會打電話通到外面，意在將縱火罪狀卸於戈林先生身上，這兩人也被捕了。當訊問他們時，他們承認與社會黨及其機關報有關係。關於這個問題上，眼前不能多所發表，偵查工作是正在進行中。」

在所有各篇官方的通告中，這一篇通訊稿儼然像一個神祕的石壁矗立我們眼前。有人常常認溝通國會與戈林官邸的地道之暗示爲不經意的供語。這種笨拙的判斷，實不近人情的。我們反可以考慮是否有人故意在這一點上關照大家呢。這個疑念可因另一事實而強化，即通訊稿有心涉到有兩人想通電話到外面的事實；『電訊聯合社』即屬於胡根堡的通訊社，甚至進一步說這次電話是打到前進報去的；它於是告訴兩個人物說國會縱火事件是奉戈林命令執行的，並且冒稱它是受前進報的委託而傳播這個消息的。前進報總主筆立即極力否認這個消息，並且證明沒有人會通電話與報館談關於縱火的消息。

隨後，大家再也不提這些神祕的打電話者，即在來比錫法庭的各被告中，也絕不見他們的影子。照這種情形說，他們乃出於假造的，但是誰出來假造呢？果然是有人，爲著某種原因，想在公衆眼

前，將『放火者』與『戈林』兩個名詞膠着一塊嗎？當然的，官方機關報隨後便指為『毀謗』；然而，目的中的效果終於產生出來。

所產生的效果乃為『放火人戈林』這個公式立刻遍傳街上。在宣傳技術上最無經驗的新進者，都能預料到這個結果。所以很難相信那裏面是一種無心的笨拙行爲。恰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可以肯定在政府內部，有人使用在他權力範圍一切可能的方法，想使大眾明白縱火事件之真正的煽動者。

從這一方面發出這種驚人的暗示，大有加以鄭重考慮之價值。牠是一種徵驗，並且是很嚴重的徵驗；牠是不能成爲證據的——我們須特別注意這一點——但一到法庭拒絕或避免審查牠的內容，牠便成爲一個證據了。有一個前任有名的部長，曾爲布魯寧內閣閣員，在電話中與戈林激烈爭論之下，曾罵後者說：『得啦！不要再向我們提你的金諾維柔（Zinowiew）式的放火啦！』這是引用著名的金諾維柔信札的典故——英國保守黨在一九二五年的選舉前，發表這封信札，結果會使工黨遭受嚴重的打擊，但事後證明牠是偽造的。

在來比錫法庭裏，人們聽取不適當的證人。他們傳訊大家所指控犯同謀罪的國社黨各領袖。他們應當邀請巴本先生，並且訊問他所知道關於奧柏佛命博士的記事冊的來歷。或許巴本可以說出真正的作者。或許他甚至可以指出放火者……。

在客觀上，人們可以說放火者爲一批共產黨人與放火者爲一批國社黨人，是同樣有可能性的。但檢舉方面不提任何一批的共產黨，而即提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在這種情形下，這種可能性是傾向於國社黨方面了。人們比較容易相信一批孤獨行動的國社黨人可以下手放火，其結果將有利於他們的政黨，但不容易相信共產黨負責的各領袖可以做這種舉動，因爲後者不至不明白這種舉動將有害於他們的政黨。國社黨放火的夥伴到底與黨的領袖有着什麼樣的關係呢，合夥者是什麼人呢？無疑的，探索究竟是很危險的。

有人將預言家漢努森 (Hannussen) 的暗殺案——司法當局始終不會過問——與國會縱火案聯繫一起，且以爲預言家認識縱火案的主謀者。這個假定至少有與以審查的價值。漢努森因爲一種不相干的原因，會在那時充任柏林挺進隊之最高領袖的黑爾道夫伯爵身邊擁有很大

的勢力（他甚且企圖利用這種勢力以作欺騙的行爲）。黑爾道夫素來很迷信，無論如何，會在長時期中信任這個預言家——並且不是亞利安種——他並且參預奧柏佛命記事冊所指爲縱火案煽動者之羅姆的密切朋友的團體裏面。柏林警察總監的位置原應交給黑爾道夫而非交給利威素海軍少將，但因爲巴本反對而作罷。到漢努森死後，黑爾道夫於四月初被召回慕尼黑，失掉柏林挺進隊首領的位置，而退處波斯丹警察總監的位置。如果黑爾道夫熟悉國會縱火案的來歷，則漢努森之同時聽到一點消息，乃是很可能的事實了。後者並且會利用這種情形以發出失火的預言。（他說：『我看見一座大建築物燃燒起來。』）

可是，在放火那一夜中，黑爾道夫的行動實使人相信他是熟悉內容的。不錯的，即在他本人在來比錫法庭所說的話中，便可以看出；他說，當他在一家飯館裏聽到國會失火的消息後，他便回家睡覺。他處於柏林挺進隊最高領袖的地位，從李普克尼希館中所搜獲的文件裏面，他已知道共產黨將於第二天清晨四點鐘起事，便仍然這樣的行動嗎？假定黑爾道夫是一個被告而不是一個證人，則人們可以駁他說，因爲要做出事件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證據，他竟至做出這麼完全不合理

的舉動（這是刑法家所深切明瞭的情形）。當一個人已經知道共產黨的暴動連同縱火可以毒物滲和食品將於第二天即刻發生，並且本身又爲柏林挺進隊的首領，他使不至即在聽到國會已經燃燒的時候回家睡覺，黑爾道夫伯爵是否即屬於格來行所指出的『德國最優越的社會』裏面嗎？

因爲過於明瞭許多事實，另有一個人，國際訪員喬治·柏爾博士（Dr. George Bell）於四月三日在奧大利國境的庫夫斯登（Kufstein）城附近，被從巴伐尼亞乘兩輛汽車來的不知名人們所暗殺。柏爾爲羅姆的舊同事；他曾參預有一次偽造蘇俄銀行鈔票的事件。他能夠使用絕頂靈活的手段，使褐宮內部之各對立的壁壘都對他發生感情，不論對於羅森培也好，對於羅姆也好，他都有着最圓滿的關係。在某時期中，他影響羅姆的力量是到了那麼重大的程度，竟能使羅姆會見帶共和主義色彩的帝國旗協會的一個主要首領邁爾。在這次會面中，羅姆極坦白的披露他本身的政黨中某某派別的情形，並使對手明瞭無論在那一個壁壘裏面，軍人應當聯合起來，以打破文人之傲慢的優越地位。柏爾曾熟悉此中的祕密並及羅姆之受大眾激烈抨擊的私人生活之種

種特點。從一九三二年來，他已脫離羅姆，他怕生命發生危險，會將實情儘量告訴第三者。所以他的暗殺案的來歷，很可以說明出來，無須牽連到國會縱火案件；但有些證人卻肯定他也曾將縱火案的祕密告訴他們。

總而言之，唯有法庭可以列出確定的證據。可是，我們已看到有無數的徵象及證人的剖白，無論如何，可以爲托耳格勒辯護。法庭既然拒絕各被告延請外國的律師，即絕對守中立的律師，我們很難希望有利於各被告的證據可以全部利用。至於期待有害其它方面的同謀罪的假定，可以得到人們的考慮，則希望更少了。既然國外對於戈林會作嚴重的控告，因爲什麼理由可以拒絕非德國的律師出庭辯護呢。果然是無可掩飾的話，則將外國辯護人混湊法庭中，對於德國政府應當是一件愉快情事。

爲什麼他們要拋棄這件愉快情事呢？(註)

(註)來比錫法庭從九月二十一日開庭，經過三個月的審問後，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讀判決書。凡得陸布被判處死刑；托耳格勒、狄米托洛夫、波波夫及塔捏夫均宣告無罪。國社黨機關報以司法的謬誤形容這判決書。

八 「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

有一件事實是確定的：即國社黨極力利用國會縱火事件。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總統簽署第二號緊急條例，「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牠廢除憲法承認公民所享有的一切基本的權利，從這個時候起，牠永爲統制希特勒的德意志之法律。條例的主要各節如下：

「在新命令頒佈之前，德意志人民的憲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七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三條，以上各條均停止發生效力。政府可以限制個人自由，發表思想的權利，以及出版自由與集會結社的權利；郵政電報電話的通訊秘密不受保障；政府同時有權檢查人民住宅，沒收及限制個人財產的權利。」

另有兩節規定各級苛刻的刑罰，死刑可以隨便施行，譬如，遇有武裝抵抗的情事，即使在行動中不會發生殺人的結果，也可受死刑的處分。

總而言之，這是等於從前的戒嚴法。但是，以後者而論，權柄應操在軍事當局的手裏。國社黨人很機巧的利用施萊轍的理論，說軍隊不應滾入政治的漩渦，因此能夠將權柄移交警察當局，換句話說，關於普魯士境內，交與戈林。

立刻，戈林下令拘留全部共產黨的國會議員，以及一批社會黨的議員與左傾的政客及著作家；他不僅禁止共產黨人開會和共產黨的機關報出版，並且勒令所有社會黨的機關報停版十五天。理由：凡得陸布曾自認與社會民主黨有關係。我們曾知道過幾天後這件事即被大家認為偽造的；但戈林仍然一期又一期的重申禁止出版的命令，直到了社會黨機關報陷於破產，最後由所有者手裏被人沒收為止。挺進隊的人物，穿着警察別動隊的服裝，坐大汽車在城中奔馳，闖入『馬克思主義者』的住宅，將他們拖到挺進隊的營裏去，而在那裏而將他們打成半生不死——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實有另闢一章與以敘述之必要。在放火案發生後四十八小時內，普魯士境內有二千人以上被拘留；因為他們的人數隨後不斷的增加，挺進隊於是設立了許多收容所，而在那裏面，照佛力克的用語，教化馬克思主義者，使成為社會之有用的份子。

照希特勒的意見，大部份的人民是以爲共產黨藉社會黨的援助而放火燒燬國會。在從前不甚糾亂的時期中，所有這些輕信者都投票擁護德意志國民黨，現在他們投國社黨這邊來了。

其他的選舉人，心中危懼，而且在看到郵信與電話的祕密取消後，他們便疑慮投票的祕密是否比較受了官方的尊重。左派政黨的競選集會是被禁止舉行了，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機關報也不見踪跡了。三月五日，在許多投票分所前，甚至沒有手提社會黨廣告與散發社會黨票單的人。情形固然如此，選舉的經過仍然很有規則。共產黨還未受取締；假定已經取締共產黨的話，則共產黨的選舉人將投社會黨的票，結果將增強社會黨的地位了。當然的，無線電播音幾乎只許國社黨使用，唯有右派的政黨可以有時利用。

參加選舉的人數是特見增多：佔全部選民之百分之八十八。希特勒爲國社黨提出全數選區的名單中的領袖，得到一千七百二十萬票，即佔全部選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零九。他不僅可以補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的失敗，並且遠遠超過他於七月三十一日所建到的高峯。

新國會共有六百四十七名議員，分配如下：

黨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國社黨	二八八	一九六	二三〇
社會民主黨	一二〇	一一一	一三三
共產黨	八一	一〇〇	八九
中央黨	七三	七〇	七五
德意志國民黨	五二	五二	四〇
德意志人民黨	二	一一	七
德意志國家黨	五	二	四
社會基督教黨	四	六	三
德意志農民黨	二	三	二
瓦敦堡農民大同盟	一	二	一
其他政黨	一	二二	二三
共計	六四七	五八五	六〇七

在同時改選的普魯士邦議會裏，國社黨在總共四百七十四議席中得到二百一十一個，德意志國民黨得到四十三個。

照上面所說，在兩議會裏面，『國民團結的內閣』都擁有絕對的多數。不過，在國會裏面，希特勒須藉德意志國民黨的援助，纔能得到絕對的多數。胡根堡果然是選舉戰中真正的戰勝者嗎？

假定沒有戈林和沒有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則胡根堡將為真正的戰勝者了。不錯的，經宣告共產黨不受法律的保護後，絕不是六百四十七名議員，而是五百六十六名議員，進入國會。而且戈林可以隨意在這五百六十六名中除去若干社會黨的議員——將他們送入收容所。所以國社黨穩穩的擁有絕對的多數，而為選舉中真正的戰勝者了。

參加希特勒內閣的各資產者祇有善處逆境了。他們會希望整頓秩序，但結果是迫處革命的狀態中。他們固然會期待挺進隊之戰勝的前進，但並不期待國會的縱火以及各處設立收容所這些事實。他們會希望狂風暴雨停止，而又假裝不會看見。有人會將關於各種殘酷行為的確實文件交與巴本，他看到後，失聲說道，他不能心到這樣的情形。洪水已擁上他們的身邊，但這些國民戰線

的先生們，端正頭上的帽極力保持尊嚴無比的態度，猶同身在作樂遊巡的途中。

第十七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至二十三日

三月五日的選舉之最驚人的事實，乃爲國社主義在巴伐尼亞與來因蘭佔勝利。這兩個地方，一向構成天主教政黨的城堞。而巴伐尼亞的國社黨人，竟遠遠的超過直到那時候號稱最強有力的政黨在其他各邦中也發生同樣的情形。

戰勝者等待他的時期降臨。隨後，挺進隊便開始動作，掃蕩各邦舊政府。在全德國境內，它們大隊巡行各都市，佔據公共建築物，劫掠各工團的會所，搗毀社會黨機關報的印刷所。它們遍處懸掛卍字旗。

從三月六日起，戈林已經親身命令各省長，不得阻礙挺進隊在公共建築物上豎起卍字旗的舉動。佛力克在他那方面，則於三月八日，任命國社黨的人物爲巴登、瓦敦堡、薩克森及紹謨堡·里卑（Schaumburg-Lippe）各邦的內務部特派員。派到薩克森的特派員爲國社黨議員基林格，

即愛斯柏格暗殺案的預謀人物。

在巴伐尼亞境內，直到那個時候，大家從來總是宣佈說：『如果中央政府派一個特派員來，我們即在邊界上把他拘捕起來。』因為大家一向總是將這個特派員當作『普魯士人』看待。可是現在國社黨卻派一個純粹的巴伐尼亞人去，這個人是比當時現任的任何一個部長都要得人民的愛戴：愛勃將軍。到三月十六日，黑爾德內閣下臺了，在正式宣言書中，它自己表示退職。

一 保守派之投降

國社黨人在他們的戰勝宣言書中，常常提起這些日子為消滅馬克思主義的日子。其實，他們是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競爭者。果然我們要試用『戰勝馬克思主義的人』這個術語，則真正的戰勝者乃是巴本，而他的勝利的日期，為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反之，他是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這個日期中失敗了。

不錯的，興登堡是於這個日期簽署保守派投降的命令，照這個命令所說，『從明日起，直到關

於國旗的最後決定實現之日止，黑白紅三色旗與卍字旗須同時懸掛……至軍事的建築物及海軍軍艦則僅懸掛德國的軍旗。」

最後的一句話，實爲圖中之唯一的黑影。國防軍還不肯任人拖到國民革命的漩渦中。

然而，國民革命則繼續牠的侵略。德國中央銀行總裁路德博士，於三月十六日，讓位於野心的沙赫德博士。原爲一個澈底的共和主義者之路德，則被任爲駐華盛頓大使；在華盛頓，他卻與高彩烈的爲國社黨効勞了。

此外，戈培爾於三月十四日被任爲部長。因爲使他可以發揮他的特殊天才起見，於是創設『宣傳部』。在隨後幾個月中，這個宣傳部爲國社黨的主張，爲希特勒的個人，同時不忘爲本部部長長的個人，作了備極圓滿的工作。戈培爾於不動聲色之中，將他的同事的各部機關收爲己有，即如外交部之情報司，郵政部之無線電，內務部之電影事業及教育部之政治學院等等。

二 波斯丹紀念日

在三月二十一日，即新國會之尊嚴的開幕日期，戈培爾第一次大表現他的才幹。波斯丹軍營的教堂被選為開幕的象徵的會所。興登堡在一篇短促的演說裏，宣稱人民已經以無可否認的多數擁護他所委託的政府。隨後，他走入貯藏大腓特力遺體的墓室，肅默數分鐘，全場均作宗教的靜默。

幾個鐘頭後，國會聚集於迅速改為議場的克洛爾大劇院，開始工作的會議。共產黨議員——大多數已關在牢獄裏——當然全部缺席，社會黨議員缺席者也有九名。

三 國會之屈伏

過後兩天，國會開第二次會。政府方面，需要通過一條授與政府全權的法律，使從二月一日以來事實上獨裁的政權經過合法的批准。照憲法的規定，如要通過這條原案，祇須得到出席的議員——而不是全部的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現在祇須使若干名議員離開會場，便可成功。到開除八十一名共產黨議員後，事情容易辦了。不過，權力還操在中央黨手裏，它可以用投票反對

的辦法或棄權的辦法，拒絕以全權授與希特勒。所以希特勒極力用威脅與利誘的手段，以買好天主教派。他答應後者的領袖喀斯說，所有投票贊成這條法律的各政黨，都聯合組織一個工作委員會，形成一種精華的小國會。當然的，希特勒後來是照過去一樣取消這個許諾，或許祇有中央黨領袖故作信任的表示。在中央黨領袖心中，最關重要者，乃為希特勒在政府宣言裏面，對教堂作某種保證。

在他的闡明政綱的演說中，希特勒會說了下面這些話：『政府無意將國會所賦與的全權，使用到超出執行根本不可少的步驟之必要的範圍之外。無論是衆議院或參議院，都不至感受脅制。總統的地位及其權利，永遠是不可動搖的。政府的最大義務，乃為始終與總統和衷共濟。德國各邦的獨立，不至受到侵犯；教堂的權利，不至受到限制；牠與政府相互關係的狀態，不至發生更動。』而最後到了直截的結論，即整篇演說所着眼的地方，他便說：『政府以準備實現未來的德意志協調的和平合作之可能性，貢獻各政黨。但它同時很堅決的并且準備着以拒絕的態度對付抵抗的表現。諸君，現在是歸你們身上來決定和平或戰爭。』

戰爭嗎？這即是希特勒最後一句話；即是說，他反抗另一半的德意志人民之永遠不停的戰爭。這一半人民是已經解除武裝了，勝利當然是屬於他了。在講臺和過道中，夾在議員座席中間，站着挺進隊全副武裝的人物。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社會黨敢投反對的票，便可算個人的勇敢的表現。社會黨領袖渥托威爾斯（Otto Weis）解釋社會黨反對的理由的演說，雖然在形式上流露怯懦的態度，確仍是有勇氣的動作。喀斯在半冷酷半爲難的態度中，解釋中央黨所以不管種種疑慮而投票贊成的理由；他重述希特勒在預備談判中所答應的種種諾言。大家在那個時候所認爲還有威權的政黨的演說者（指威爾斯），也得到某種成績；即希特勒本人也對他鼓掌。授與政府全權的法律遂以四百四十一票對社會黨的九十四票通過了。全部國社黨議員鼓舞歡騰，大唱何斯特·維

塞爾歌（Horst-Wessel Lied）。

第十八章 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七月

一 各邦「總督」之創設

三月二十三日以後，德意志各邦的統一，即是說，對於重要的管理位置的侵略，繼續進行。三月三十一日，內閣發表一篇命令，後者的作用是使各邦政府脫離各個的議會而獨立，恰與中央政府內閣之對於國會一樣。此外，邦議會都被解散，不經過新選舉，而按三月五日的選舉票數的比例，重新組織起來，共產黨則當然被排除了。全國其它各級議會，直至規模最小的市議會，全照上面的原則改組。因此，在全國各種議會裏面，國社黨人不但一下子擁有普通的多數，而且經取消共產黨的選票後，擁有了絕對的多數。

可是，這種情形還是不夠滿足希特勒實現統一的志願。四月七日，內閣頒佈一條法律，總而言

之，這條法律是等於永遠取消各邦的獨立，爲的是它在各邦的首腦部設置總督(Statthalter)，由中央政府內閣直接任命。總督的權力是等於真正的絕對專斷的君主的權力，從任命邦政府內閣各部長及解散邦議會的權力起，以至任命全部官吏與法官(在新制度下，法官變爲可更動的)及頒佈特赦的種種權力。此外，在普魯士邦內，總督則爲中央國務總理所兼任。

這一個步驟是對付國務副總理巴本的，直到那個時候，巴本以中央政府特派員的地位，在普魯士邦內擁有權力，而德意志國民黨則希望他被任爲普魯士內閣的首相。不錯的，希特勒兼任普魯士總督後，即於四月十一日，表示選取戈林，而戈林於是充當普魯士政府的首相了。另有兩個國社黨黨員，刻爾(Kerrl)與魯斯特(Rust)，前者被任爲普魯士內閣的司法部長，後者被任爲文化部長。以最後的抵抗戰壕而言，祇餘胡根堡以特派員名義所綰領之普魯士內閣的農業部與經濟部了。可是，希特勒避免以部長名義給與胡根堡，後者祇能保持特派員的名義了。

戈林一做了普魯士的首相，便發揮整個政治力量以對抗希特勒所切望的統一，他在每個情形中，都極力維護普魯士的自主。在他於五月十八日在邦議會中所發宣言裏面，他說：『建築帝國基礎之重要的任務，是靠於在前世紀已經完成過這個任務的普魯士。』他又說道：『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我總不願普魯士的所有權脫離了普魯士。』當七月中間，有人提議將東普魯士改建行省，使牠與德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戈林便宣佈說，無論何人如果宣傳這種主張，他便將這個人送拘留所去。

爲使普魯士的光榮能在德意志的眼中更見燦爛奪目，戈林便撤消舊日的評議院，而代以一種新的議事機關。舊評議院不過是各省的代表機關。國社黨工團的領袖雷伊博士求得了主席的位置。戈林不願長期有這個對頭，他便於七月八日，公佈新評議院的組織法。從此之後，評議院的議員是受首相的任命。那些議員是包括各部長、各次長與教堂、科學界、藝術界、經濟界及勞動界的代表。但評議院裏面最重要的一批，則爲國社黨的職員所構成的：挺進隊總部領袖，即羅姆，衝鋒隊領袖，即興姆勒，工團領袖雷伊，全部普魯士各黨區領袖及各省挺進隊首領，都爲評議院議員。以某種

議會的地位而言，評議院不過爲首相支配下的一個諮詢的議會，首相卽爲裏面的主席。但在個人上，每個議員都在他所關係的省內，擁有至高無上的勢力。各省省長在決定任何重要的步驟前，必須先向代表本省的議員報告。在有些情形中，如任命官吏的情事，評議院議員的否決是最終的決定。

評議院是設於柏林皇宮，卽前皇帝的舊居，任何人都可隨便將牠比擬舊王朝時代的皇室資政院。牠是代表普魯士的光榮的，而現在的巴伐尼亞人海爾曼戈林則想復興這個光榮。

同樣的，在其它各邦，各總督幾乎是違反本人的意志，而傾向於維護本邦之特殊的利益。在巴伐尼亞邦，總督愛勃原是澈底的聯邦主義者，永是忠實於微德爾斯巴克王室。當他巡行邦中，穿白衣的女郎在凱旋門下，向他贈送花冠，那時他已不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是還在期待收回在他看守下的世襲采地的人的代理人了。所以希特勒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演說裏，發出激烈的威嚇的確，在眼前，這種希望非撇開不可，或許在相當時期中，還得如此。國社主義革命在巴伐尼亞發生後，魯博烈黑特王子因爲躲避爭論，或許因爲某種更討厭的事情，而作希臘的旅行。到他回來後，愛勃

總督走來謁見，而以新的官階進見王子；王子祇對他說一句話：『人民的好賊！』並且即離開他了。

三 各政黨之消滅

(一) 社會黨 極迅速的，或許迅速的程度是遠在國社黨人希望之上，革命消滅了那時候還站得住的政黨。趨於極端的政黨，即是說德意志國民黨與共產黨，支持比較長久。

到現在，共產黨還支持某種祕密的抵抗，固然因受倒戈行爲的影響而日見衰弱。

社會民主黨之崩潰是比較更迅速的了。因為挽救黨的機能起見，它的領袖渥托·威爾斯，曾於三月三十日，脫離第二國際的機關，因為第二國際極力反對希特勒政府所採取的方法；到後來，他曾說這次脫離第二國際的機關，乃是一種策略的作用，但這策略的作用仍是無效力的。到四月二十七日，社會民主黨又做繼續生存之新的嘗試，選出新的機關。後者公佈一篇議決案；照那裏面的決定，社會民主黨應在新的『合法的可能性』的範圍內，繼續活動。兩個星期後，在五月十日，戈林便不游移的指示出這種『合法的可能性』是什麼樣，佔據了社會民主黨的黨機關和機關報。

雖然受了這種壓迫，社會民主黨仍是低首下心，甚至於五月十七日，在國會中，贊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演說。在演說前，佛力克曾在領袖委員會威嚇大家說，如果政府得不到一致的贊成，則他不管各議員的性命，更不管關在收容所的社會黨人的性命了。

社會民主黨的大部份領袖，陸續出國。其他幾個，如塞維林及前任主席羅培（Löbe）等，則仍勇敢的留在德國，但也毫無政治的作用。在布拉格，成立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新機關。到六月二十二日，佛力克宣佈嚴禁社會民主黨在德國活動。各議會、各市議會的社會民主黨議員都受除名的處分，機關報則永遠禁止發行。大部份的被選者遭受拘禁，其中便有主席羅培。議員約翰斯忒林（Johannes Stelling）被暗殺。守「合法的可能性的範圍內」的社會民主黨也斷送了。

（二）中央黨 在某期間中，天主教的中央黨還自以為有在國民團結的政府內扮演角色的希望。其實，中央黨的領袖喀斯很早便判定這是無望的。反之，布魯寧還於五月六日，接受替代喀斯當選。他以爲希特勒一向對他表示的實際的考慮可以實現。不久後，希特勒便使他覺悟了。六月十五日，希特勒在柏林召集國社黨各領袖，通知他們說革命仍在繼續進行中，他說：「到今天，國社主

義革命的動力性仍然支配德意志的進展啊！

這樣，他是發出信號了。六月二十二日，挺進隊在巴伐尼亞，奮擊巴伐尼亞人民黨的各領袖和各處機關，而且幽禁各份子，佔據和沒收各機關。許多教士也被逮捕，巴伐尼亞之外的其它各邦的天主教議員，則遭受比較沒有這麼殘忍的待遇，但希特勒卻通知中央黨說後者再無存在的理由了。七月五日，中央黨機關自己宣告解散中央黨。

(三) 鋼盔團 爲壓服保守派的抵抗起見，國社黨向兩方面進攻，進攻的結果是：德意志國民黨被解散，爲挺進隊的對敵團體的鋼盔團被武力所鎮壓，而終於投降。鋼盔團的大部份領袖，對於塞爾德之加入希特勒內閣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表示不滿意的態度。這大部份領袖的爲首者是第二首領杜斯忒堡。塞爾德原是缺乏任何強有力的意志，現在爲買好希特勒起見，便於四月二十六日，撤免杜斯忒堡。所假藉的理由，乃因爲杜斯忒堡的祖父是猶太人。到第二天，塞爾德加入國社黨，并在無線電廣播的演說中，通告鋼盔團是受希特勒的指揮了。

(四) 德意志國民黨 因爲鋼盔團脫離了，胡根堡失掉最必需的支柱。次長俾斯麥克 (von

Bismarck)曾企圖創立一個名為『德意志國民黨鬪爭團』的團體，以替代綱盜團。因為他之澈底的君主主義的觀念，俾斯麥克即於四月九日，被驅出政府。他企圖集合抱保守主張的青年，并使他們身穿綠色的襯衫，他甚至極力吸收從前左派政黨的份子。

但國社黨即刻採取反抗的行動。六月十四日，在多特蒙得 (Dortmund)，警察總監——從前為挺進隊首領——發出進攻的信號，他下令取締鬪爭團的支部。到二十一日，在全德國境內，挺進隊大舉進攻。藉着警察的援助，他們佔據鬪爭團以及德意志國民黨的會所。兩方面都開槍射擊，甚且都有死亡。在一場熱烈爭論的內閣會議中，胡根堡作了無用的抗爭；他滿臉怒氣，離開會議室，並且命令立刻派一個專差到紐狄克進見興登堡總統。但後者卻被挺進隊的地方支隊所看守了。在全德國境內，德意志國民黨便開始自然的崩潰了。到六月二十七日胡根堡下野，而希特勒則於二十八日，命令執行委員會的三委員解散德意志國民黨。

兩個星期後，內閣於七月十六日，頒佈取締組織新政黨的法律，裏面第一節是說：

『德國祇許有一個唯一的政黨：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四 國防軍各總督與挺進隊

如果我們不會看到布倫堡將軍之想爲堅決不理政治的國防軍部長，則我們將完全不認識國防軍在國社黨政府內所扮演的角色。施萊轍已經過於藉他未曾實際利用的軍隊勢力來虛張聲勢。從他之不生光榮的失敗發生後，佩指揮刀的階級之弱點與政治上無定見，是揭發無遺，他們已經是談虎色變了。從此後，國防軍祇管它之軍事上的工作，並且嚴格服從它的最高領袖，這個領袖在今天還名爲興登堡，或許明天便名爲希特勒了。雖然對挺進隊嫉妬的維持它之唯一的軍事地位，它仍極力給與國社黨政府以後者所需要的威望。

七月二十三日的軍事法修正案，許各總督在遇着政治暴動的情事，得調動國防軍的武力。這個步驟之真正的意義，乃爲保證希特勒可以對付挺進隊各首領之產生獨立的異志。因爲各總督總是希特勒的心腹，並且屬於黨的文人組織中。

希特勒的全副精神，是在限制挺進隊的勢力。在五月七日，他還答應什列斯威·好斯敦的挺

進隊說：『算賬的時期果然到了；我們要冷酷的實現我們的話，一步不放鬆。』在六月中間，我們會經聽到他仍然主張繼續革命工作。然而，經過兩星期後，他於七月二日，驟然間宣佈以最殘忍的手段，對付爆發第二次革命的企圖。

挺進隊一步一步的失掉它的地位。在五月九日，戈林已經嚴厲禁止各個警務官吏掛名於挺進隊、衝鋒隊或綱盔團，甚至禁止佩帶卍字臂章。在八月初，他甚至想解散警察別動隊。在七月十七日，愛勃總督得到希特勒所賦予的非常的全權，以取締羅姆所不能制止或不欲制止的挺進隊的過度行爲。這是等於直接抨擊羅姆了。

羅姆不是一個能忍痛吞聲的人物。正當希特勒於八月六日，在巴伐尼亞之奧柏沙斯堡 (Oberaulzberg) 城，召集國社黨領袖大會時候，羅姆則召集全部柏林的挺進隊，約八萬二千人，集中於騰柏霍夫 (Tempelho) 講武場，向他們作一篇激烈的演說，裏面最熱烈的一點是：『凡認爲挺進隊的任務已經完成者，須自問是否承認我們應當站着不動，而且永遠不動。』這是等於宣戰了，不僅是針對戈林或愛勃這類人物，且也是針對經濟部長斯密特 (Schmitt) 或大實家提森這類

人物，後者們曾希望排除經濟上搗亂份子的挺進隊，並且想將他們送去做工，使成爲無害的份子。

五 共和政治乎君主政治乎

到奧登堡死後，國社主義的政權要如何攫取老元帥所保留之剩餘的權柄呢？唯有希特勒，或許加上戈培爾，曉得。在希特勒登臺不久，國會曾匆遽的通過一條法律，照這條法律的規定，設使總統忽然出缺，則由來比錫最高法院主席代理職務。然而，照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授與政府全權的法律的規定，元首不參加立法的工作，則元首的重要性已大見減削了。加之，七月十四日會通過一條法律，許政府向人民徵求對某種辦法的意見，即使這種辦法須引起修訂憲法的結果。

這條法律是極重要的，因爲從此後政府可以詢問人民，是否再舉新總統，或則任命攝政。它可向人民提出羅森培最近出版的『二十世紀的神話』書中所提的計劃：『國家新創造人的任務，是在於組織一種人的聯合，即一種德意志人的階級，裏面份子爲在我們民族復興中會作最有力的努力的人物……元首——總統，皇帝或國王——將由這個階級的會議選舉，或即在它的內部

的人物中選擇，元首的任期是終身的。』即是說，所需要的是一個選任終身的元首，或許即是選舉一個皇帝，雖然這個名稱是不很適合希特勒的觀念的。不管怎樣，法律准許希特勒向人民要求他所喜歡的事情——而人民也將作希特勒所喜歡的答覆。在這種情形下，保守黨的復辟，或再造霍亨索倫王朝的夢想，頓成泡影了。到今天，國社黨祇能接受曾助它扶搖直上的人們。在這些人中，絕無舊皇室各王子的地位了。

第十九章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月

一 國社黨之攫取工團

希特勒政府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它宣佈五月一日——勞動節的那天——爲國慶日，因此將社會民主黨在經歷十四年的共和政府中所不能實現的工人的和平一下子實現了。這一個舉動實使工人階級產生一種非常的印象。在柏林，有一百萬以上的人聚集於騰柏霍夫講武場。

在他的演講中，希特勒宣稱，大家應泯滅對肉體勞動至今還存在的社會鄙視的成見：『你們尊重勞動罷，尊敬勞動者罷！』其實呢，這個好主意之感動勞動者本身，還不及感動資產者那麼深刻，勞動者所最注重的，是得到比較公道的報酬和享受比較多的餘暇。所以，這篇演說，總而言之，是躲避社會問題這裏所關係的問題是飲食問題，而希特勒所唱社會尊重勞動的高調，或許簡簡單單

單是爲他個人收攬人心的高調，是不對題的。

可是，在這個國慶日之燦爛奪目的外表後面，而聚集了一批隊伍，準備炸毀各工團的會所。在五月二日早晨在全德國境內，許多滿載挺進隊隊員的大汽車，停在各工會門前，佔據了這些工會的辦事室，拘捕了它們的各領袖。主持這番動作者爲雷伊博士。即國社黨組織部領袖。天主教的工會和中立的工會，都自願屈伏。它們全部聯合起來組成『德意志工人戰線』。其領導權即屬於雷伊博士。

二 農業政策

這是在胡根堡下臺後，希特勒纔能圓滿施行他的農業新政策。他任命瓦爾脫·達雷爲糧食部部長。

瓦爾脫·達雷生於一八九五年，像許多國社黨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德僑；他是出生於阿根廷。他到糧食部接任後幾天，拿騷（Nassau）的農民爲這個年僅三十八歲的青年，建立一塊龐大的

石紀念碑上面刻了這個碑文：『紀念瓦爾脫達雷，拿騷感恩的同鄉農民立。』他本人也坦然作紀念碑揭幕的演說。在虛榮心上，他或許是超過戈培爾了。

爲使農民留在田間起見，達雷宣傳回土地去和保護農民階級。關係的原因，特別是保證在戰事發生中全國的糧食。達雷藉他所創製關於世襲農地與關於創立農民的世襲財產權的法律，想強迫農民永遠充當農民，即使是違反農民自己的意願。另一條制定於九月十六日的法律，許他有權決定農作面積的廣袤，決定耕種農產品的種類，直至於決定販賣的價格。

三 小商業政策

在新政體成立頭幾個月中，希特勒全副精神是在鞏固他的政權，而將經濟政策的指導權讓與胡根堡。在他於三月二十三日在國會所發表的演說裏，他曾承允極力鼓勵私人的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

當胡根堡仍然在位之日，國社黨人關於經濟問題上的政治活動，主要的是傾向於藉小企業

的組織而進攻。大商店與消費公司都受抵制，而被迫到破產的地步。牠們的經理是被送到收容所去，而堅要到被取締的商店購貨的人們，則受到無可恕的恐怖手段的威脅。

到了這些強暴行為發生結果，許多商業機關平常收容幾十萬職員，現在都走到破產的路上。希特勒於是否認他從前所作一切的許諾了。到七月初，國社黨人便被禁止繼續攻擊大商店，而兩星期後，消費公司也處於政府的保護下了。『改造中等階級』的問題，此後是再不提起了。

四 希特勒之放棄理論的『統一指揮』

在那個時期中，發生了六月二十七日的大政潮，結果使胡根堡失掉他的部長位置。經濟部的繼任者為保險聯合會總經理孤爾特·斯密特博士（Dr. Kurt Schmitt），他是新近加入國社黨的。在三月五日，許多企業機關會從新抖起勇氣，并會希望局面復歸穩定。交易所中的行市有着一番強烈的上漲，便為這種情況之迅速的反應。但是，隨後又發生了悲苦的失望。外邦的敵視，尤其是從四月一日抵制猶太人後——我們隨後再講這個問題——益見確定，和政局之飄搖無定。

——即希特勒顯出無力制裁的挺進隊與各軍事團體之好戰的示威運動與放縱的行爲所造成的局面——使人心發生動搖，所以，交易所的行市便急轉直下了。斯密特博士之入閣，實表現在國社黨的經濟問題的領袖中實行一番總清理，和正式的放棄革命。

在一篇演說裏面，希特勒宣佈放棄革命，恰如列寧之宣告實行新經濟政策一樣。七月七日，他對應召的各總督說，革命並不是永久不變的狀態：『我們不應因爲一個良好的經濟專家還未成爲國社黨，而將他撤免，尤其是如果我們所要改任的國社黨人，對於經濟是完全不懂的。我們絕不是倚靠着理論的「統一指揮」(Gleichschaltungen)，便可以麵包給與工人，便可取消失業。這裏不需要理想的綱領，乃需要七百萬人的每天麵包。』

五 抵抗失業的鬭爭

在德國好幾省中，國社黨的領袖奮身投入『抵抗失業的鬭爭』裏，組織許多『戰線』，爭前恐後的佔領『陣地』，資本家受了道德上的義務的強迫——這個道德上的義務是無底止的

——而雇用工人，即使到了企業機關的狀態不許雇用新工人時候，資本家也非雇用不可。在東普魯士、蓬麥綸、西勒西亞各省中，各總督彼此對敵，每個人都想佔先宣告他的境內已不見一個失業者了。一部份的失業者是被雇為卑溼區域的雇農，一部份助耕大面積的與中等面積的土地；在這地方，他們之被收容是不支工錢的，在某地方，他們是被視為低廉的或甚至無報酬的手工，僅領取政府的金錢救濟。

在這種辦法之外，還成立『自願工作』制（到第二年便成為強迫的了），在那裏面，三分之一的時間做工，三分之一的時間做運動，三分之一的時間做軍事練習。

總而言之，在一九三三這一年，抵抗失業的鬭爭，其結果是：使失業者作不十分生產的努力，所以是不十分得到報酬的；將生產的工作分配於數目更大的勞動者；在小部份的工作裏，有將舊失業者與不曾得到救濟的新失業者作簡單的調換，後者是將工作讓與前者。

在國稅收入正在減少中（在一九三三年第二季，減少了七千一百二十萬馬克），戈培爾博士則於『抵抗飢寒』的大宣傳運動裏面，向私人經濟抽取了三百萬馬克。任何專制君王，都不能像

國社黨人那樣，大規模的組成強迫贈禮的制度。不過，國社黨應承認，在秋初勞動的市場的狀態會發生變化，但卻不是整個的復興，而大家所切盼的經濟恢復景氣，卻不會產生。

六 猶太問題

當希特勒上臺時候，大部份德國人以爲他將放棄反猶太主義。但很快的大家便知道判斷錯了。在三月頭幾天，國社黨熱心的義勇隊已經開始拘禁和虐待猶太種的公民了。這種狂暴行爲的消息曾引起國外輿論激烈的反響，因爲現在不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者』的事件，而採取對付政治敵人的步驟，而卻是反對宗教上與種族上之少數民族了。因此，戈培爾提議採取對付國外的反抗之報復的辦法，即以有組織的經濟的抵制剷除德國的猶太勢力。但比較明白的國社黨人，即如沙赫德，卻反對這個辦法。到最後的利那，纔放棄杯葛政策；但是，大家已經不能將杯葛運動領袖斯特萊撒所已經着手的準備，完全停止。因此杯葛運動便實行一天，即四月一日星期六那天。許多義勇兵看守猶太商店及醫生與律師的住宅的門口，禁阻顧客進去；在玻璃窗上和牌子上，都貼了

冒罵猶太人的通告。

到第二天，杯葛運動是停止了。反之，政府卻採取反對猶太的智識階級之合法的運動。希特勒向醫生代表團宣佈說，自由職業中應消除大批「異族」的執業醫生，不然的話，有人可以認為這些異族的醫生之智識優越的表現。四條重要的法律曾經頒佈出來，即四月七日之改組公務員的法律，四月十日之關於准許執行律師業務的法律，四月二十六日之限制德國各學校外籍學生的法律，及勞工部之規定醫生加入社會保險局的條例。

關於公務員的法律，宣稱說，凡非亞利安種的現任公務員全應免職，除非曾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前進機關服務，或於大戰中曾在前線作戰，或於大戰中會失掉父親或兒子。凡在父母兩系之四個祖父母中，祇要一個不是亞利安種的，本人即不是亞利安種了。因為這個非常廣泛的條款，有一大批人都受法律的限制，而這些人尚且懷疑本身是否有一個非亞利安種的祖先呢。不久後，政府便禁止公務員娶非亞利安種的婦女。

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律師，藉以禁止猶太人執行律師的職業。同樣的，疾病保險局所雇用的

猶太種醫生，也漸漸不能執行他們的業務。但是關於將來利害關係之最重要的法律，乃為規定猶太種學生進學校的法律；平均算來，猶太種學生不得超過學生數目比例之百分之一·五。因為這個數額的規定，猶太人之受教育是幾乎不可能了。

可是，經久之後，最使德國猶太人的命運發生影響者，乃為對待他們之精神上的差別待遇之劃定，這種情形已經是將他們幽禁於一種『蓋托』的空氣中了。許多猶太人，因為怕受苦惱，除了出去工作或須不可避免的出門外，都不敢離開他們的住所。最多數的猶太人是想離開德國，但不幸他們的苦境恰與發生經濟恐慌的時代同時降臨，在經濟恐慌發生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收容新來的勞動者。在德國方面，有人估量移居國外的人數——裏面最大部份是猶太人——是到了三萬人。這個估計必定是在實際情形之下的。法國是收容了最多的德僑的，據牠的估計，在八月中，法國境內有四萬德僑。在收容德僑的國家裏面，已經有人提出抗議，反猶太運動或許也會擴展到這些國家。

在國社黨當權期中，猶太人運命好轉的希望是空想的。或許從取締猶太的律師和醫生的步

驟中，我們可以認爲不公道的競爭之一種手段。但種族的觀念已經生出新政府所有負責的人物所極端認真看的一種倫理觀念了。在本年春天，有一個外國極重要的外交家曾拜訪希特勒，并會遇着後者可作不僅關於某一個题目的討論。反之，在猶太問題上，他卻遇到頑強的抵抗。這個外交家曾問他說，他個人是否曾經認識了猶太人；希特勒回答道，他歷來幾乎不會同猶太人來往，但在他少年時代，他曾一度從同寓的猶太汽車商人受了極不快的經驗。隨後，他便改談其它的問題，藉以表示他認爲討論猶太問題是無益的。

七 革命的暴行

在國社黨各領袖的演說中，我們常常聽到這一句話：即從來不見如一九三三年的『國民舉義』之那麼有訓練與少流血的革命。累次固持這種抗辯，便可證明這個話在輿論中的信用是很少的。希特勒有一句話是很著名的：『他不曾動猶太人一根頭髮。』在一次談話中，他曾承認他所發動的革命曾犧牲了二十多人的生命。可是，持最厚顏的論調者則爲羅森培：直到現在，他於九月

二十五日對索厄維因 (Saunwein) 說道：大家總以為社會革命必定連帶最野蠻的暴行的；德國居然不會產生這種現象，實使全世界感覺驚異。

本段祇談到世界所已經認識的強暴行為。我們祇將國社黨本身所不能否認的暴行，做一篇總表：即德國報紙所報告的暗殺政治敵人或猶太人的事件。照這個計算，從一月三十日到八月二十三日，國社黨的敵人死了一百九十六個，至國社黨方面，則死了二十四個（在這個總數中，包括下面這些事件：有一個犯人在企圖逃獄中被殺死，有一個自己上吊，有一個趁人不注意中跳窗死了）。從三月五日，即有計劃的暗殺之開始，到八月二十三日，政府的敵人死了一百四十五名，國社黨則僅死了六名。

必定的，實際的數目是遠在官方口供的數目之上，而官方的數目，無論如何，也與希特勒所稱之總數二十不相符。所以，外省的報紙，甚至於國社黨的外省機關報，所登載之暗殺事件的消息，不曾為各通訊社與各大報紙所轉載，而一百九十六個的總數，即是根據後者的記載而得到的。必然有許多死亡的數目，全不會登載出。即如在六月二十一日，挺進隊於柏林·哥布尼克 (Berlin-

Köpenick)所鼓動的衝突中，至少死了七個人，而官方祇承認死了四個，其中兩個是義勇隊隊員。社會黨議員斯忒林之慘酷的暗殺案，用布包乘他的屍首，投到河裏，這個消息從來沒有在報上登出。曾經證實之在不藍士外喜和在慕尼黑附近的達沙 (Dachau)收容所中的死亡者消息，同樣是沈寂無聞的。

收容所的組織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囚人關在裏面。據官方的消息，在七月十一日那天，他們的總數是一萬八千人。在那個時候，這個數目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但到現在，它必定不是的確的了。不錯的，我們知道警察是有權隨意捕人的，無須將被捕者帶到法官面前。在各個收容所中，有些還負相當『好的』名譽。其他的，如慕尼黑附近之達沙收容所，柏林附近之奧拉連堡 (Oranienburg)收容所，或北勒斯勞附近之杜爾哇 (Dirgoy)收容所，至少在某期間中，成爲恐怖的地方。的確的，在七月中，達沙收容所不能不用警察以代替國社黨義勇隊的看守者，而杜爾哇收容所不能不被裁撤了。

我們可以在這裏敘述一個絕對正確的事實，它雖然與死亡或重傷的情事無關，但可使最惡

劣的待遇成爲可准許的舉動。在七月中，有一批工人在柏林被捕，而帶到檢察官面前。檢察官便提出通常的問語。到快要結束時候，他問道：『你是共產黨黨員嗎？』如果被告答應說是的呢？法官便站起來，伸開他的手，打被告一嘴巴。在被捕者中，有好幾個婦女，其中有一個是六十一歲的年紀。法官也一樣的打這個老太婆一嘴巴。

八 德國與國際

本書前面已經闡明新生時代之國社主義的外交政策的理論。本節祇簡述國社黨上臺後的外交政策。

希特勒之遇到外國的不信任，實爲大家所可預料的，因爲直到這時候，不論他說什麼話，他所揭發的總是報復。但是，照例一個活動家，一到了登臺後，態度便顯然的穩重了。法國大使弗郎沙·龐塞 (François-Poncet)，於料到國社黨的成功之下，曾作了法國政府與希特勒妥協辦法之基礎的判談。此外，希特勒之消滅共產黨，祇有使列強對他發生好感。

然而，四月一日之抵制猶太人，便將這種情形完全破壞了。據國社黨人的意見，寰球的猶太人，靠着他的龐大勢力，實鼓動全世界反對德國。其實，經過的情形是極其簡單的。在外國眼中，杯葛運動實爲國社黨不曾放棄它的開始時代之最無道理的理論之明證。希特勒儘管自命有大政治家的才智，仍然以慘酷的手段實行他的反猶太計劃則總有一天，也要堅決實行他的報復計劃了。——而在這兩種情形中，他的行動到底是照本人的主動，還是受徒衆的強迫，結果是無差別的。

三月十八日，墨索里尼曾在羅馬，當麥唐納 (Macdonald) 和西門爵士 (Sir John Simon) 面前，提出在意、英、法、德各國間成立一種公約的基礎談判，即所謂四國公約，其目的爲修改凡爾賽條約。這個計劃之成功，即等於德國向前走上非常的一步。但英法兩國內部，反對希特勒政權的情緒，實有打斷這一切的希望之危險。爲試探對方的心意和廣播緩和的空氣起見，希特勒派巴本到羅馬，派羅森培到倫敦。羅森培以五月十日抵倫敦，但他之來到這個地方，引起極其野蠻的反對和極其激烈的意外事件，結果他這次遊英，在德國方面，可算爲整個的嚴重失敗，在他個人方面，可算爲特殊的嚴重失敗。從三月三十一日以來，國社黨內部曾組織一個『外交局』，但直到現在，羅森

培終不能做到外交部部長，甚至於次長。

外國的態度是越來越險惡；於是希特勒於五月十七日召集國會，在國會裏面作了一篇演說，他於演說中力辯德國的居心是和平的。希特勒之說這個話，我們可以估量他是誠實的。然而，當他要求『與法國作最後的和確定的解釋』時候，他的態度也是誠實的。實則在希特勒腦中，這兩種意見事實上並不是互相柄鑿的：他反對帝國主義，但又認戰爭是必需的。新國家主義的戰爭，可以達到統治的狀態，而使正式的併吞成爲無用的了。日本并不吞併滿洲，是把牠『解放』而使牠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希特勒之和平的演說，絕不能阻止四國公約——終於七月十五日簽字——不至與當初的本意完全相反。在牠排除由四強國單獨討論修改條約之一切可能性的新形式下，四強公約祇有成就墨索里尼的名望，而不爲德國方面形成任何的進步。

爲賠償這次失敗起見，國社黨頑強的力爭干涉奧大利內政的權利。經過停頓好幾年後，希特勒主義運動突然在奧大利發展，並超過斯泰亨堡 (Starnberg) 親王所組織之鐵兜團的純

粹奧大利的法西斯底運動。德國已經與陶爾斐斯之資產階級的政府開始談判；談判的趨勢，似乎應有成功的希望，但希特勒派來的德國代表哈畢克特博士（Dr. Habicht）所持之無厭的要求，卻把談判的工作弄僵了。結果是雙方的關係發生緊張，有時竟至像宣戰前夜之尖銳的狀態。來到維也納遊歷的幾個德國部長被驅逐出境，奧大利的一個外交家在柏林被捕；德國的飛機飛到奧大利天空散放傳單，慕尼黑的無線電臺廣播反對陶爾斐斯總理之激烈的宣傳，奧大利的邊界事實上禁止德國遊客入境。

直到現在，這種政策的結果，絲毫不使德國產生快感。直到這時候，尤其是法國，極力維持奧大利的獨立；意大利也是注意維持奧大利的獨立的，不過暫時保持緘默的態度，到最後關頭，纔露出面目。在德國國內，大家寧願絕口不談這種失望的事情，因為在其它的戰線上，尙期待意大利的援助。奧大利的變局，要強迫意大利明白的表示態度，或許恰是違反意大利自己的心意。在陶爾斐斯以八月底和墨索里尼在利西恩（Riccione）會談後，他宣布說，將在奧大利樹立做效法西斯底式的職團制的政府。或許國社黨在某種形式下，也參加奧大利的政權。然而，像德國從來是設法取

得意大利的援助的，意大利的勢力，雖然是比較不顯著的，將永為最重要的了。

眼前的德國政策之一般的趨向，是過和平的生活……直到和平停止那一天為止。牠並不喜歡看見停止和平這一天降臨，但牠先作準備，因為牠知道這一天是必不可免的。德國所特別要避
免的，乃西線的戰事，因為在這方面，牠是不易成功的。無論是奪回亞爾薩斯，或是奪回南提羅爾，國
社黨都不大想發生戰事；因為在這些戰線上，國社黨的精神上勢力卻碰到拉丁世界之鑽不進去
的城垣。反之，在東方，則還有許多空閒的土地。希特勒和羅森培所作關於烏克蘭的計劃，是大家所
知道的。他們的政策是期待最後關頭的一刹那，到那時候，西部的蘇維埃領土和遠東的蘇維埃領
土，將同樣發生重大的變遷。如果蘇俄是崩潰了——而希特勒是確信蘇俄總是一天崩潰的——
則德國將得波蘭的同意與援助，以恢復東歐的秩序；那麼，牠將可以扮演公斷人的角色，而確定牠
的統治權。做了東歐的主人翁的人，則也將做了中歐的主人翁。蘇俄方面，則極力打破這個危險的
政策，將德國關閉於一大批不侵犯條約的網中，和法國重修友好的關係，和英國積極談判經濟的
和平，並和美國談判，使牠承認蘇俄政府。

直到現在，國社主義的德國的外交政策，不曾收穫了美滿的結果，而祇有知道了德國所抱的無窮希望的人纔能了解這個外交政策。牠的出發點是下面這個信念：世界的現狀不能再長期維持下去了，在發生變化當中，德國祇有得到利益，因為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掉。這個想頭是確的嗎？德國還可以失掉一點東西呢？牠的單位。實際上，德國的政策絕不傾向於和平，乃傾向於擾亂和平。或許，牠自以為能夠在擾亂後恢復秩序；但要下手動作，則牠非需要擾亂不可。彼此相形之下，蘇聯則已經加入為維持現狀而奮鬥的保守派列強中了。

在寄託他們的希望於將來下，國社黨人實採取了一種極其危險的政策，這個政策曾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為我們指示國社黨人是到了懸崖絕壁的邊際。不過德國固然在這一天的離開軍縮會議并且宣佈退出國際聯盟會，牠並沒有使局面嚴重化，為的是牠并不能進一步的有所作為。然而，在牠的極端為難的狀態下，國社黨便依賴牠最能應用的武器：宣傳。從日內瓦排闥走出來，希特勒曾放棄精細計算的一種幽默的動作。一方面，他喚起最切合英國人心理的公平待遇（Fair-play）的情緒；另一方面，他邀請法國直接同他妥協，即使同樣的英國心中發生恐慌。而且將

外交政策的方針交公民投票決定，他又可得到靠得住的勝利，因為施行恐怖與宣傳的結果，大部份的德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是與他作同樣的思想。

在國社黨所使用之對內政策的方法與對外政策的方法中，有驚人的相符合的地方。國社黨之在德國上臺，是藉警告資產階級說，國社黨的崩潰即等於共產主義的勝利。現在牠在國際方面，也玩這套把戲，牠警告德國的各鄰邦說，如果希特勒垮台，則鮑爾雪維克主義將進展到萊茵河，而且無疑的不久便要渡過河了。

德國宣告退出國際聯盟會之第二天，人民觀察報便提出這個新口號：希特勒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人』，他之關切其它的國家，實強過於這些國家的指導者。在這種話裏面，實有離間外國人民與其政府的企圖，但在另一個企圖上，成功的希望是比較少，即離間各個政府的企圖。在國內的政治鬭爭中，國社黨是敵不過聯合起來的全部敵人的；但像後者是彼此互相對敵的，國社黨便成爲最強的了。在對外政策上，希特勒做同樣的打算。假定德國的敵人不能聯合成爲一個共同的戰線，則德國之不可撼動的精力，將壓倒各個分散的敵人了。加之，國社黨人預料，在不不久的將來裏，

法國因爲牠的國內政體之庸弱無能，將淪於第二等強國的行列；他們又預料到，在法國方面，和德國開戰的理想將逐漸成爲不可理會的了，到了那種情形，德國祇須提出一篇口頭的抗議，而不必倚靠其它方法，便可隨意撕毀各條約了。

將這種政策之烏托邦的雲霧揭開之後，我們便覺得希特勒是復歸曾使威廉第二及其首相善羅（Bilow）淪於失敗之地的同樣的方法了。不錯的，國社黨人之在國內可藉以成功的活動，是不能應用於國外的，因爲他們的敵人並不是德意志人。我的意思是說，外國人之超過我們德國人並不是在空想上，而卻是在政治的明晰上。所以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終歸於失敗的。

第二十章 結論

崇拜英雄的民族

國社主義所追求的，到底是什麼目標呢？

這個目標並不會標明在二十五項的綱領中。它是在希特勒的腦中逐漸形成的，而隨希特勒之傳授於他的門徒而逐漸確定的，它即是使德國人成爲崇拜英雄的民族。

我們是說，崇拜英雄的民族，而不是說：英雄的民族。從這裏面產生會經極其精細的研究的企圖，即是創造一個新的更純粹的模型種族，後者享受更廣大的權利，但同時也負擔更高超的義務。國社黨各領袖曾嘗試好幾條路徑以達到這個目標，希特勒則任經驗決定那一條路徑是最佳的。有一個事實是存在不變，並可引起各個公正的人的注意：即這個企圖，目的是在於從一個絕頂

特殊的民族中，用人工抽出一個領導階級，由這個領導階級以一個模型和一個單位給與這個民族。照國社主義的觀點，民族並不是每個都具有創造的發展之個人的一個集合體，但乃爲供人忍耐的給他以一個模型的原料。受人陶冶的意志，自加剋制的精神：這便是德國國家主義的祕密所在了。

無疑問的，國社主義羣衆是惑於一種單位的情緒，這爲德意志民族一向極少領略到這麼濃厚程度的情緒：即是皈依一體的信仰，而這個信仰是壓倒各種利益的對立，能使東普魯士的雇農與來因蘭的葡萄業工人或與德國中部的化學業工人互相接近。

在未來的歲月中，希特勒的一切努力是趨於統制這個局面，即使他不能統制的話，他至少也要永遠支持這個局面。他之能夠壓倒敵人的優點，乃爲他了解所有可向人類要求的東西是什麼。靠着這個柔軟的和有黏性的材料，像希特勒那樣的領袖便可以得到非常的成績。即使是因爲飢荒的問題，他爲什麼不能鼓動至少一部份的民衆呢？在某時期中，蘇俄便會這麼做到。

所以，國社主義政權或許可以維持下去，所倚靠的是：徹底利用牠的勝利，極力掩飾牠的失敗，

而且在玩危險的把戲之下，將牠的希望寄託於世界經濟復興中。在著者寫出這幾行時候，希特勒可以穩得半數以上的選民的默許；但這批緘默的和小心謹慎的羣衆是不應與黨徒的狹隘小團體混爲一談；後者是極力使冷談的左右這一幫人趨於熱化。我們可以說，從三月五日後，希特勒獲得了一大批的信徒，這些人是經過冷靜的考慮後，纔以幸運給與希特勒，並且準備享受希特勒努力所得的收穫。固然，在相反方面說，希特勒舊部中之許多熱情者是感覺受騙了，但許多社會黨的份子和共產黨的份子，因他們的領袖投降而受摧殘後，現在則將他們的希望寄託於希特勒身上，這些人之歸附，大足以抵償上面的那個損失了。

國社黨現在已經做到使德國的政治生活之繁冗的和個別的形式成爲灰燼了。要使外國的讀者能夠明瞭國社主義運動，我們須指出鬭爭精神和熱烈的必勝的心志，爲國社主義運動之主要的特徵必定的，讀者將感覺驚異，何以到了今天，對於德國的政治，有人還是除了以拚命鬭爭的形式，卽裏面是手扼敵人的咽喉和刀刺敵人的額角的形式，以形容牠之外，不能作其它的想像。在最近幾年中，特別爲德國青年所歡迎的政治學的教材，乃加爾·斯密特教授的政治學的教材。照

這個教材所說，政治的定理，乃爲友人與敵人之間的關係；牠故意的不知道外交的用處。凡要在德國於政治上獲取勝利者，須從事破壞。然而，我們應當承認，在今天，這種情形並不是德國的政治生活所獨有的。

經濟恐慌是不分彼此的而掃蕩世界各國，猶同死亡的對人生是無分彼此的。每個國家，都照自己國民的性格，而設法反抗這個恐慌。可是，在初期中，我們到處發覺了牠們取消了資產階級的生命某某種自由權，即智能所藉以發揮牠的創造能力的各種自由權。放任的時代，即在那時代，人們認每個創造必然是良好的，就使在幾個不同的創造中，存在着根本不相容的現象——這個時代祇有在德國的結束了。可是，我們希望這些黑暗的日子過去。是的，我們要確信——而我們確是如此的——衰落時代之真正的生產品之德意志國社主義不能獨存於衰落時代之後，而且我們不要忘記，在歷史的瞻望中，人生不過是一個極其短促的過程。

到那一天，權力主義也將失掉牠的光芒；朝氣蓬勃的人們起來，反對服從的理由。到那時候，羣衆的智慧突然明白了所有現在這些反對正理與邏輯的邪說，不過是那些渴望政權的野心家之

一種詭計，那些野心家是訓練人們以愚拙自誇，而使他們自己的工作變成容易的了。

這些活潑潑的人們之贊成水平化和均一化的熱烈情緒，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們之情甘淪於不識不知之地步的歡心，是從那裏來的呢？這種分化個性的工作，不過是一種時代的表象，這個時代是滿意智慧之減退的。國社主義之將個人鎔化於國民的集合體裏面，實在是在政治上做了與科學界之新的研究方法相等的工作。科學是改用了歸納法，後者是倚靠統計，由個別的觀察出發，而藉推論以設立假定的。同樣的，醫學的趨向，是藉觀察病人之全部的構造而確定了診斷法，而不靠觀察病人的病象。所以，在政治上與在科學上一樣，集合體是壓倒了個體。我們要解釋這種進化的現象，可以說牠是一種自衛的反應；各個國家都在自己的周圍纏繞一層厚繭，以抵抗由十九世紀中所實現之龐大的知識發展而產生之超出尋常範圍的問題與義務。這種作繭自縛的狀態，即法西斯主義與自然的定律將我們引到那裏面的狀態，根本是一種自衛的，非英雄主義的，犧牲的狀態，它是絕不像法西斯主義之引證維金（Viking）的詩中所粉飾的狀態。在這一點上，人們認識那裏面的矛盾嗎？人們認識那裏面的扯謊嗎？

這種撒謊乃是冒稱爲一種英雄主義的學說的撒謊，實則這個學說不過是逃兵的一種虛張的聲勢。國社主義者躲避進步之門，而逃入緊閉門戶的屋中；躲避個人的責任，而依賴所奉到的命令；放棄自由的動作，而採取服從的態度。這個學說是表現疑懼新的曙光、新的空氣和未知的宇宙，牠是渴望休憩的肉體對於不疲乏的精神之一種抗議。事實上，牠形成對於情感之過高的估量和對於理性之過低的估量，獎勵狹隘的精神而蔑視高超的德性，即是時代的特質之趨於陰性化的一種證據。或許，這個現象便是因爲在一切的國家裏，男性人口的精華是留在戰場中，這一個事實所產生的結果。

可是，我們不能否認，國社主義是天天運用廣大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力量。然而，這些力量不是用在一個目標上；牠們是倒過來摧殘他們本身；牠們使人民陷於分崩離析，而從來祇有推動自己前進。情形是一樣的，這個國家主義之出神的注視，眼光從來是朝向它自己，同樣的，它的行動從來是落到自己身上。滿意自己與自己立主意：這便是這個國家主義之領導人民的最好的力量所趨的方向了。在這個反猶太的大運動中，我們可於十三世紀中彌漫歐洲的事情裏面，找出一個

先例：即鞭撻自己的人們。自動犧牲之病態的嗜好，是滿載於天天對挺進隊所作的演說中，帶着一種久已超過廉恥的範圍之外的無所顧慮的態度。這些人們以目空一切的慷慨情緒來談犧牲，好像是談體操的練習一樣。

在前後十四年中，國社主義武裝起來，以反抗一個虛無飄渺的勢力，並且在自己的周圍築了一座鋼山，這座鋼山現在滑動了，而壓碎了一個極微小的敵人。在德國的劇臺上，我們現在看到神話與政治相混合。譬如，在牆壁上面掛了許多古代劊子手的利劍的戈林部長，或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政治家，但以象徵的面目而論，他是冠冕堂皇的代表着他的時代，他的主張，或許甚至於他的人民。無情的巨人和密德加德（Midgard）的毒蛇，從北方的重霧中，現出可怕的面目，同樣的，法國的機關槍和英國戰艦的大炮，從世界大戰的重霧中，現出來，猶同猶太的毒物的觸角一樣。即因為對付這些觸角起見，國社主義造成一種戰爭的器械，後者是在國內的戰線上，繼續世界戰爭。在這個地方，德國人之睡遊的天才，終於找到了戰場，而在這戰場上，他看到了不戴面具的惡魔，後者不是穿着聯盟軍的軍裝的了。在這個地方，一切都是帶着適合於他之不羈的幻想的形式，在這個

地方黨的同志都帶着英雄的面目，敵人則都帶着賣國賊的面目。在這個地方，他繼續他於一九一八年停止但又不曾放棄的鬪爭；在這個地方，靠了精神的鬪爭，世界大戰的暴風雨可以繼續大發癲狂——因為在德國人的靈魂中，世界大戰是不死的。我們不要將國社主義認為歷史之偶然的事變和嚴重的錯誤，但須認為一種運命的嘗試，即德意志人民到最後祇有不是勝利便是消滅的結果之運命。戰敗者之反抗未死者之這個鬪爭，曾在德國延長了十四年之久而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死人是——暫時的——戰勝生人了。

德意志的靈魂躲避過於慘酷的運命的兇光，躲到一種絕妙的英雄故事之仁慈的黑影裏面。最近，德國的戲臺會演了關於瑪倫（Marne）戰役的一劇。在戲臺上，大家看到了德國參謀部的軍官，站在滿插小旗的地圖前面，做了劇文的演說，這些演說是告訴觀客說，在那嚴重的一刹那，如果幾個軍官不會缺乏了毅力，則事實上德國軍隊是打勝仗了。德國軍隊裏面的專家們會對這個與事實不符的表演提出抗議。但結果不發生任何效力。一批廣大的民衆自願受編劇家的影響，以為瑪倫戰役，『實在講來，』是一番德國的勝利，而有一個戲曲批評家便可以寫道：雖然是不適合

於歷史，但詩人的職務則爲創造一個神話。

一個神話嗎！

誰人向民衆說出真理呢？

在這個時候，真理、公道和自由，都一時感覺不快。但是，在這個試驗的期中，民衆或許知道鑑定他所已經失掉和將要失掉的東西，爲德意志民族着想，他還是從新爲爭回自由而長期奮鬥，不要使這個自由竟消滅於無用之中啊。

